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美中新冷戰？美中日學界的觀點

A New Cold War?

Academic Perspectives in the U.S., China, and Japan

四辻光紀

Koki Yotsuji

指導教授：唐欣偉 博士

Advisor: Hsin-wei Tang,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August,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美中新冷戰？美中日學界的觀點

A New Cold War?

Academic Perspectives in the U.S., China, and Japan

本論文係 四辻光紀 君（學號：R08322038）在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2 年 6 月 20 日承下列
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唐欣偉

（簽名）

（指導教授）

鄭子真

楊代學

謝辭



非常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唐欣偉老師。我困擾決定論文題目等時候，老師每次都給我很多建議，樂意地與我討論論文。有唐老師一直以來的支持才能完成我的論文。也非常感謝口試委員的鄭子真老師與楊仕樂老師給我很多建議與鼓勵，有老師們的珍貴建議使我的論文更好。

另外，我想感謝系辦的助教們以及政治系的老師們，雖然我並不優秀，我在政治系學到了很多知識。

我要感謝研究室的同學們，俊丞、勝惟、智恩、Dorota、勝凱、新侑，每天在研究室過地又很舒服又快樂。因為有同學們，我有動力每天去研究室。在研究室過的日子永遠記在心中。

非常感謝家人一直以來的支持，才能完成碩士生活。

我想以後也好好珍惜在台灣得到的回憶與知識。

四辻光紀

摘要



本研究探討美國、中國和日本各個學界將現在美中關係是否視為「美中新冷戰」。美蘇冷戰結束後，在美中關係間出現軍事競爭、威權國家重新崛起的狀態。此外，在 2018 年時美中貿易戰的開始代表美中關係的惡化，該貿易戰從貿易領域擴及到安全保障問題以及軍事問題等。因為這些背景，在不少場合描述現在美中關係的時候開始用「新冷戰」這個詞，有些學者認為現在美中關係是「新冷戰」，則有些學者認為不是「新冷戰」。所以，這個論文的問題意識是「新冷戰」是什麼？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看法，以及這樣子的原因是什麼？本研究整理美中日個學界的看法，其中美國與中國的學者裡否定現在美中關係為「新冷戰」的比較多，日本學者則肯定現在美中關係為「新冷戰」的比較多。不管美中日學界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新冷戰的主要判斷基準是現在該兩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及治理價值觀上的不同，美國有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國則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因此將冷戰為不同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間的競爭的話，現在美中關係是新冷戰的狀態。

關鍵詞：美中新冷戰、新冷戰、冷戰、美中關係、國際關係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regarded as a "New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y various acade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Japan.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military rivalry and the re-emergence of authoritarian states. In addition, the star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 2018 represented a deterior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trade war expanded from trade to security and military issues. Because of these backgrounds, the term "New Cold War" has been used on many occasions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 are a "New Cold War", while others believe that it is not a "New Cold War".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this paper is what is the "New Cold War"? Why are there different views, and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this? This study compiles the views of American,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Among them, more American and Chinese scholars deny that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 "New Cold War", while more Japanese scholars affirm that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 "New Cold War". Regardless of the U.S., Chinese, and Japanese academics' main criterion for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hip as a new Cold War i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ideologi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governance

val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th liberalism and capitalism in the U.S., and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 Therefore, if we consider the Cold War to be a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then the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 state of a new Cold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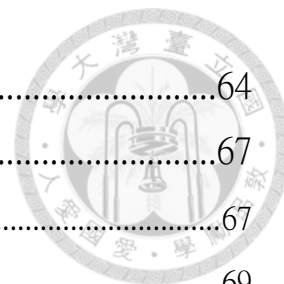
Keywords: U.S.-China Cold War, New Cold War, Cold War 2.0, U.S.-China relationship,

目 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 錄.....	VI
表目錄.....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背景介紹.....	4
第三節 研究設計、方法與限制.....	8
第二章 美國學界的看法.....	9
第一節 「新冷戰」爭議出現的背景.....	9
第二節 肯定論.....	14
第三節 否定論.....	17
小結.....	24
第三章 中國學界的看法.....	28
第一節 「新冷戰」爭議出現的背景.....	28
第二節 肯定論.....	33
第三節 否定論.....	35
小結.....	44
第四章 日本學界的看法.....	47
第一節 「新冷戰」爭議出現的背景.....	47
第二節 肯定論.....	54
第三節 否定論.....	59
小結.....	61

第五章 結論	64
參考文獻	67
一、中文部分	67
二、英文部分	69
三、日文部分	71
四、網頁部分	73



表目錄



表 1 美國學界的看法	24
表 2 中國學界的看法	44
表 3 日本學界的看法	6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伴隨美蘇冷戰的結束，出現了脫極化、脫軍事化、脫意識形態、脫威權主義體制化以及脫開發信仰化等的現象（石井貫太郎，1991：52-56）。但是，這幾年來在美中之間重新出現軍事競爭，中國和俄羅斯等威權政權弱化自由主義秩序，很像冷戰的狀況（Kagan, 2008）。

美中之間的軍事競爭而言，中國不斷地增加軍費。對此美國與東亞國家感到懷疑，美國不放棄在亞洲的領導地位（王高成、王信力，2012：49、56）。在 2017 年 12 月川普發表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和 2018 年 1 月發表的「國家防衛戰略（NDS）」裡，修正歐巴馬的方針，則表示由軍事力來追求國際秩序的穩定，並將中國大陸視為企圖改變世界秩序的「修正主義勢力」的競爭國（松本はる香，2019：95；遊川和郎，2019：7）。川普政府在安全戰略上提出「印太戰略」，結合亞太地區的印度、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等盟邦及東南亞國家，明確的對中國進行圍堵與制衡（胡聲平，2019：14）。

另外，中國的威權化而言，在習近平政權時期刪除了任期限制、對社會強化管制、限制與國外人士學術合作、緊固網路控制、統治言論和意識形態等（Doug Bandow，2018；小嶋華津子，2019；吳玉山，2021：17）。此外，中國在南海（South China Sea）舉行實彈演習（live-fire drills），甚至通過了「香港國家安全法（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加強了司法迫害民主運動人士，這使美中關係惡化（Hseik-wen Soong, 2020: 1）。



從 2018 年美中貿易戰升級，¹被擔憂美中關係的惡化（趙可金，2020：17；松本 はる，2019：1）。雖然川普再一次申述表明遵守歐巴馬與習近平的備忘錄安全五點共識，但是將重心放在中國的貿易戰，針對華為以及其相關企業所進行的「對內管制（實體清單）」實際上是對中國的國際統一戰線，以「五眼聯盟」對中國的科技圍堵，進入以科技為主的新冷戰（林正義，2020：42）。美中關係從貿易問題擴張到技術霸權問題，甚至到台灣等中國周邊的安全保障問題以及軍事問題。美中之間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也愈來愈大。從貿易戰開始，美中關係以競爭與衝突為主調，更為全面的新冷戰是趨勢（田飛龍，2021：79）。這樣子的美中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之間的主要差別為難以實現美中經濟脫鉤、意識形態所扮演的角色等等。共同點為地緣政治上、兩個權力之間的緊張關係等等。在學者和輿論中將這樣子的美中之間的日益緊張的關係稱為「新冷戰」一直流行，同時判斷目前中美關係是否「新冷戰」以及如果不是的話發展成「新冷戰」的可能性有多少，這些成為重要議題（Keikichi Takahashi，2022；趙可金，2020：16；於海洋、馬躍，2020：16；黃忠，2022：77）。如此，現在美中關係大部分方面都是競爭或衝突，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首次推出了“新冷戰”系列（Seth Schindler., Jessica DiCarlo., Dinesh Paudel, 2021）。

對於這些背景，「新冷戰」這一詞因為可以簡單地表示現在的國際關係，所以媒體上也廣泛地被使用（吉村，2021：68）。中國不少人認為中國在大部分領域成為世界第二，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尤其是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實際上島嶼領土權的爭端等軍事緊張局勢正在加劇，在東亞地區持續軍事擴張，其中，中國是最關注的。這樣子的背景之下出現現在美中關係是否「新冷戰」之討論（牛軍，2019：72）。

但是，對此議題有些學者認為現在的美中關係是「新冷戰」（New Cold War）²，則有些學者並不認為是「新冷戰」，在學術界未有統一的想法，缺乏完整的論

¹ 雖然在 2018 年 5 月和解一次，但是最後破局（游智傑，2020：10）。

² 「新冷戰」這個詞很廣泛的被使用。它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從 1979 年末到 1980 年中期。也就是 1970 年代緩和政策（*Détente*）的盛衰（*rise and fall*）之後的美蘇關係再次進入緊張時期（山本健，2022）。接下來這詞在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之間關係的脈絡之下出現。從 2006 年到 2007 年在

述。準確定義美中關係的屬性和特徵，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和政策問題（趙可金，2020：15）。本文的問題意識是「新冷戰」是什麼？為什麼有不同的看法，它的原



因是什麼？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綜述美國、中國與日本各個學界對於現在的美中關係的看法，是否將美中關係視為「新冷戰」。關於整理美國與中國學界的看法的理由是該兩國是「新冷戰」的當事國。另外，選擇日本學界的原因而言，日本是第三大經濟體。³

本研究是文獻綜述（review article）。文獻綜述的貢獻在於整理其議題的問題所在、可以瞭解在該領域當中已經被研究的是什麼，並還未被研究的是什麼以及對此需要什麼樣子的研究（大關浩美，13）。因此，本研究的貢獻與目的在於除了釐清美中日學界對於美中「新冷戰」的看法之外，整理在美中「新冷戰」討論裡有哪些研究，並指出哪些還沒被研究。可以瞭解現在美中關係究竟是甚麼樣子，能夠貢獻以後的美中關係研究。

探討美中「新冷戰」之際，通常需要回答什麼是美中「新冷戰」以及在經驗上現在美中關係是否符合美蘇冷戰之脈絡。

普京的俄羅斯威權主義（Putin's Russia authoritarianism）和後蘇聯的主張，這樣子的脈絡之下被提出來的。在伊拉克戰爭和介入主義（intervensionism）的爭議之後，新冷戰的觀點是站在美國領導權爭議的理由上（Grzegorz，2022：24）。最後是現在的美中關係、美俄關係上被使用。其中，美中關係上被使用的「新冷戰」也有不同的用法，有些人認為是多極的「新冷戰」，有些人則認為是兩極的、美蘇冷戰的再來（吉村拓人，2021：71）。本文聚焦於現在美中關係上所被使用的「新冷戰」。

除了「新冷戰」說法之外，也有「美中冷戰」、「類冷戰」，的說法（李明，2021：21）。李本京（2022）因為當前中美決鬥並不構成「冷戰」之必備條件，所以他認為現在的「冷戰」不足以稱為「冷戰」，則稱它「類冷戰」。英文為 new cold war, the second cold war, cold war 2.0, cold war II 等。

³世界銀行所發布的 2021 年 GDP 排名之前三名為美國、中國接下來為日本。

<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

第二節 背景介紹



因為理解新冷戰時需要關於美蘇冷戰的知識，所以在此首先介紹美蘇冷戰的內容與脈絡。

冷戰史研究從冷戰起源論開始，以後其焦點轉移至發展成國家安全保障、軍事戰略、意識形態間對立等，在冷戰結束後其研究範圍擴及到冷戰與文化、社會間關係，冷戰與技術等領域，甚至開始研究冷戰作為一個國際政治狀況如何與人權、文化、社會與宗教等各個領域擁有關係，因此需要理解整個冷戰的話，不僅需要研究地政學、權力政治、意識形態以及體制間矛盾，還需要研究原本與冷戰沒有關係的歷史現象與冷戰間的相互作用，這樣子才能夠看得到冷戰的多面（菅英輝，2021：1-4）。

對於美蘇冷戰起點的一個看法是 1947 年開始的，具體而言 1947 年 3 月的杜魯門美國總統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裡的演說，其內容為主張對希臘與土耳其的援助，此時杜魯門總統使用了「自由主義體制」和「極權主義」這兩個概念來將世界二分的看法，也就是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山本健，2021：44-45）。⁴另外的看法，美蘇冷戰可以分為七個時期，即 1945-1946 的謹慎友誼時期(Wary Friendship)、1947-1952 的相互敵對及交戰期(Mutual Antagonism and Beligence)、1953-1962 的艱苦談判與緩和行動期(Tough Talk, Accommodative Action)、1963-1968 的和平競爭期(Peaceful Competition)、1969-1978 的和解時期(Détente)、1979-1988 的後和解時期(The Postdétente Era)以及 1989-？的新時代時期(New Era)（丁永康，1990：70；Charles W Kegley, Jr & Eugene R. Wittkopf, 1985:48-64）。關於美蘇冷戰的結束，一般而言是 1989 年 11 月 9 日之柏林圍牆倒塌，在美國「冷戰勝利論」被接受，「歷史終結論」也流行（菅英輝，2021：7-8）。

⁴ 當時在希臘共產主義勢力激化武裝鬥爭，在土耳其蘇聯為了擴大其影響力施加壓力（山本健，2021：45）。



關於美蘇冷戰發生的原因，一般而言有兩個主要因素，即意識形態對立與權力鬥爭。美國與蘇聯各自主張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意識形態的普遍性，認為將自己所相信的體制擴及到其他區域是它們的一種使命，美國以形成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秩序為目標，蘇聯則以形成社會主義的秩序為目標，此使命感和權力鬥爭一起使美蘇對立激化，也可以說美蘇冷戰是全球化規模上建構治理體系（governance system）的霸權體系（菅英輝，2021：6）。

關於美蘇冷戰的主要內容而言，美蘇冷戰是指主要行為者（國家）在對立關係的兩極體系，美國與蘇聯由意識形態來二分世界的期間，其中決定其國際體系為兩極體系的原因是軍事力、主要是核武器的均衡，除此之外，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在經濟以及安全保障領域上維持對立關係與集團化，在 1950 年到 1960 年代是東西的內部抗爭，到了 1970 年代德國與日本開始經濟成長，中國以及南方也開始發展，因此也有主張此年代為多極化時代言論，但是美蘇冷戰的前提是美蘇軍事間的對立，這些國家的發展沒有使得該兩極體系崩潰，加上英國以及古巴等美蘇在海外設備核武器之時也其使用決定權屬於大國，這些大國的優位性使得同盟國在軍事上、技術上難以獨立，雖然由意識形態二分的世界，但是它們彼此沒有發生直接的衝突的原因也是該兩個陣營都擁有大量核武，擁有共同的世界觀，即糾紛規模巨大化以及雙方的核武有能力毀滅世界，這樣子的美蘇冷戰的結束是由反對蘇聯改革的保守派之政變失敗，導致蘇聯崩潰，到了 1989 年馬爾他峰會（Malta summit）結束對立（吉村拓人，2021：75-77）。

關於美蘇冷戰的定義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美國）與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蘇聯）之間沒有直接戰爭的政治衝突狀態」（丁永康，1990：70；Arglela E, Stent, ed,1985:2）。這個衝突的原因在於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地緣政治觀，衝突的型態有軍備競賽、偶發性的間接戰爭特性，包括超級強權的代理人以及其他衝突形式（丁永康，1990：70；Arglela E, Stent, ed,1985:2）。關於美蘇冷戰的定義，黃忠（2022）整理不同的視角，也就是從歷史視角而言，冷戰是二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的共同敵



人消失了，在此為了繼續安排世界的問題而該兩國進行的合作與衝突，從其表現形式而言，美蘇冷戰是將軍事實力作為後盾、意識形態為主要武器、追求地緣政治上的對抗，從戰爭與和平關係的視角來看的話，擁有戰爭危機風險的和平狀態，也是一種和平狀態外貌的戰爭，從危機管理理論視角而言，小事件連串起來之後引爆的大危機等（黃忠，2022：80；王繩祖主編，1995：121；劉金質，2003：12；王帆，2000：34）。

丁永康（1990）將美蘇冷戰體制視為一個美蘇兩超級強國及各自代表的民主與共黨集團之間的政治互動過程。

王帆（2000）認為冷戰的定義為「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全面對抗的一種現象，這種對抗除了直接的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之外，還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等等一切領域，是一種埋藏著戰爭危機的和平狀態，也是一種以和平型態表現的戰爭」。

具體而言，「美國在 1947 年推出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組建具有軍事聯盟性質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蘇聯改變了暫時的合作政策，建立與北約抗衡的華沙條約組織，從歐洲開始與美國針鋒相對的較量，標誌著冷戰的形成，爭奪範圍迅速遍及全世界（王帆，2000：34）。」

黃忠（2022）指出冷戰就是不直接用槍砲的對峙，其有三個層次，一個資本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鬥爭與衝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鬥爭，美國以及盟友同蘇聯以及盟友的軍事對抗、意識形態的鬥爭以及為爭奪第三世界的角逐。

從冷戰產生的冷戰思維的特徵有四個，一是霸權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對立；二是追求絕對安全並設想最壞的情況，以它為政策的主要或唯一的出發點；三是必須確定主要敵手以及制定“自現預言”式的戰略規劃；四是以“挑戰史”和“謀霸史”來牽強地附會現實與未來，雖然這四個特徵裡除了第一個意識

形態或價值觀念的對立以外，其他三個特徵都國際政治的權勢鬥爭思維，但是在冷戰時特別明顯（趙慶寺，2018：29-30）。

綜合上述，美蘇冷戰的主要定義是在兩極體系下，世界由意識形態來二分、集團化以及彼此在意識形態、軍事以及經濟領域鬥爭，其背景有軍事力和核武器的均衡為後盾。

第三節 研究設計、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是文獻綜述的論文，因此筆者採取文獻分析法來整理各學界的看法以及論點。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是從美蘇冷戰結束的 1989 年到現在 2023 年，以美國、中國以及日本學界為主的學位論文、期刊論文、書籍以及新聞等各種文獻。關於其文獻蒐集方面，以圖書、學位論文、期刊論文以及網路上的文章為主。

最後，關於研究限制，本研究有兩個主要限制。第一個限制是「新冷戰」此一議題還在發展當中，因此可能其中學者在當時的看法與現在的看法不一樣。第二個限制是在美中日學界之間可能關注的議題不一樣，或有某種程度的傾向，美中學界的探討現在美中關係是否新冷戰相關的文獻比較多，但是日本的文獻大部分都以現在美中關係是新冷戰為前提，比較難看得到日本學者對於此議題的分析。

第二章 美國學界的看法



第一節 「新冷戰」爭議出現的背景

關於「新冷戰」的出現，有幾個不同看法，因此，在此首先介紹美國從美蘇冷戰結束之後到現在拜登政權的主要對中國的政策，再按照時間順序介紹美中「新冷戰」出現的美國學界看法。最後再整理各個學者對於此一議題的肯定或否定以及屬性。

壹、美蘇冷戰後美國對中國主要政策

關於美國對國際體系的看法以及美國在其中自己的位置，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決策者都認為當時的世界體系為單極體系，⁵美國單極體系也會持續而且擁有持久性，所以從1989年到1993年的喬治H. W. 布希（George H. W. Bush）政權以後，美國將維持自己的權力、不會被其他國家干擾美國現有的權力為首要戰略目標，但是後來從歐巴馬政權時「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以及川普政權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裡可以看到美國承認在國際體系裡的中國崛起以及東亞權力平衡的變化（Christopher Layne, 2020: 350-352）。⁶⁷關於美國在國際體系裡的權力，美國的權力實際上在1960年代開始衰退，其中1970、1980年代日本以及德國削弱美國的經濟，但是因為它們並不是如蘇聯般的地緣政治上的敵國，所以被忽視了，但是到了1987年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歷史學者保羅甘迺迪（Paul

⁵ 當時的美國決策者以及學者除了單極體系（unipolarity）之外，也使用帝國（empire）、霸權（hegemony）、優勢權力（preponderance of power）、美國領導（American leadership）以及權勢（ascendancy）等詞彙（Christopher Layne, 2020: 350）。

⁶ 此單極體系的意思不是國際關係理論的，而是美國的外交偏好“單極體系”，該想法反映到其外交（Christopher Layne, 2020: 350）。

⁷ 因為其中意味著美國霸權的“美國霸權”此一詞在 29 頁裡出現 100 次以上（Christopher Layne, 2020: 352）。



Kennedy) 出版了《霸權與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美國國內開始探討美國權力的本質，指出美國的權力相對性衰退，但是後來蘇聯的解體、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對美國的軍事與經濟的威脅消失了，因此美國外交上的共識一直否定美國之衰退 (Christopher Layne, 2020: 353-355)。⁸在這樣子的脈絡之下，否定美國衰退的主要主張對於美中關係提供三個看法，第一個是國內生產毛額 (GDP) 已經不是一個國力衡量標準，GDP 是衡量資源的總流量，沒有扣除成本或衡量長期的財富累積，能準確衡量如中國的製造業密集國家的經濟，但是會低估如美國知識型產業，所以未能反映美國與中國之間經濟差距的真實規模，⁹第二個是美國與中國之間存在著技術上的差距，中國難以趕上美國，加上美國善於創新，中國並非如此，第三個是中國軍事力量還未達到美國軍事力量程度，也難以趕上 (Christopher Layne, 2020: 357-358)¹⁰。因此，否定美國衰退的人認為現在的國際體系裡美國仍然維持原本的權力，美中權力還有距離。

另外，美國對於中國的政策而言，從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上美國國內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鷹派 (hawks)，它們將中國視為軍事、經濟、技術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威脅，另外個是接觸派 (engagers)，它們是相信如果中國加入國際機構，並融入國際經濟，將促進中國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美國對中國的政策都在鷹派與接觸派之間平衡，也不斷地變化，具體而言，喬治 H. W. 布希、比爾克林頓、歐巴馬政府傾向於接觸派 (engagers)，喬治 W. 布希與川普政府則傾向於鷹派 (Christopher Layne, 2020: 374)。後來在川普時期，接觸派基本上都消失了，這樣子的美國原本希望與中國合作，但是後來發生衝突的脈絡與在美蘇冷戰時期，戰後美國原本希望與蘇聯合作，但是後來轉移至激烈的競爭的脈絡是類似的，美國的戰略是與美蘇冷戰時期一樣，用軍事力量與聯盟來包圍中國，並且美中關係以兩

⁸ 美國因為基本上的經濟結構與美國和其他經濟大國之間經濟成長率差異導致美國的優勢開始被損害 (Christopher Layne, 2020: 354)。

⁹ 他們雖然還未提出能夠完全替代 GDP 的指標，不過認為會有比 GDP 更好的標準。

¹⁰ 否定美國衰退的主要人物為法理德·扎卡利亞 (Fareed Zakaria)、羅伯特·利伯 (Robert J. Lieber)、麥克爾·貝克力 (Michael Beckley)、羅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等 (Christopher Layne, 2020: 356-357)。



個意識形態的衝突來描述，中國被視為美國的危險敵國（Christopher Layne, 2020: 374-375; Jeffrey D. Sachs, 2019: 28）。對此，Jeffrey D. Sachs（2019）認為這樣子美國對於中國的看法是一種美國妄想症（American paranoia）¹¹，此主張基於三個原因，第一個是美國是一個擴張主義的國家，由於擴張主義，在到處創造敵人，包括中國在內，第二個原因是美國地理上的孤立，美國在二戰後在東南亞、中東、中南美以及非洲不理解狀況之下發動戰爭，在越南、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的失敗，此狀況似乎是偏執的幻想，第三個原因是美國社會中的社會信賴度（social trust within American society）比較低，美國擁有所有奴隸的歷史，在國內感到不同民族的威脅，這些因素代表美國容易感到威脅以及製造敵人（Jeffrey D. Sachs, 2019: 29-30）。

此外，在美蘇冷戰之後，也就是 1990 年代初，由美國主導來將中國納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實現中國容易獲得海外技術以及市場，也是一種戰略支付（strategic down payment），這樣子的接觸政策（engaging）的前提是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導致中國經濟自由化，甚至能夠導致政治自由化，但是實際上沒有根據中國會改變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在此可以看到“攻勢自由主義（offensive liberalism）”的美國外交政策，該政策的核心概念是世界由如民主主義國家的好國家（good states）和如非民主主義國家的壞國家（bad states）來構成的，這樣子的排他性在美蘇冷戰裡面也可以看到，像美國介入俄國內戰（Russian Civil War）等，兩國之間的競爭變成意識形態鬥爭時，也會變成零和博弈，對於這樣子的“自由主義”的威脅並不是中國經濟或軍事的崛起，而是對於美國的意識形態的威脅。（Christopher Layne, 2020: 379-381; Iskander Rehman, 2018: 2）。

貳、「新冷戰」的出現

¹¹ 此美國妄想症的說法是基於美國歷史學家理查·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一本書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關於新冷戰開始之最早的看法是將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作為改變美中關係的分水嶺，中國出口不振時實施了財政刺激政策，將投資集中在基礎設施上，擁有資金與國內政治影響力的中國國有企業開始挑戰他們在與美國跨國公司的合資企業中的從屬地位，對此歐巴馬政權採用了多方面的方法，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是企圖與中國接近的重要政策，此政策包含為了保護知識產權的規制、投資自由化、設定勞動及環境標準、並保障國有企業的平等待遇等，但是在另一方面明確地主張對抗中國的任何侵略在東亞的美國同盟國之行為，也就是美國將中國視為一邊是日益增長實力的挑戰者，一邊是潛在的夥伴（Seth Schindler., Jessica DiCarlo., Dinesh Paudel, 2021: 333-334）。對此，中國將 TPP 視為企圖遏制中國的增長與野心，而提出了排除美國、迴避歐美主導體系的一帶一路政策，川普則退出 TPP 意味著美國對中政策的轉變為對立與競爭，川普否定了單極自由主義秩序（unipolar liberal order），難以建立一個能夠遏制的聯盟，使得美國除了競爭之外沒有其他選項，拜登政府則繼承中國是一個競爭者之概念，並試圖透過修復美國之傳統聯盟關係來應對中國的挑戰（Seth Schindler., Jessica DiCarlo., Dinesh Paudel, 2021: 334）。

此外，關於美中新冷戰的出現，在 2015 年的時候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了美中關係的“修昔底德陷阱”¹²，探討美國和中國能不能逃避這個陷阱。¹³接著，約瑟夫·奈（Joseph Nye）、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開始關注此一議題。

川普當任美國總統的時候，華盛頓對於中國的看法更加鷹派，在美國的許多評論家依據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Indo-Pacific）的軍事競爭、美中貿易戰、華盛頓將華為（Huawei）以及其他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為商務部（Commerce Department）

¹² “修昔底德陷阱”是如古希臘的雅典挑戰斯巴達、在前一個世紀時的德國挑戰英國，崛起的大國（rising power）與（ruling power）競爭時容易發生競爭。在過去 500 年，16 個案例其中 12 個案例發生戰爭（Graham Allison, 2015）。

¹³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的出口管制名單、在 2017 年 12 月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將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美國的修正主義對手以及川普政府將中國的國際經濟角色描述為掠奪性的（predatory），預計美國與中國之間發生新冷戰（new Cold War）（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6-7）。推進這樣子的新冷戰敘述的人，關於新冠疫情（COVID-19）以及其起源和管控疫情之蔓延，美中相互指控，此包含譴責彼此的政治制度缺陷，加速了走向新的意識形態冷戰，其中在 2020 年當時美國的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麥克龐培歐（Mike Pompeo）發言說“共產主義中國（Communist China）”正在試圖粉碎世界的自由，也為了抵抗中國呼喊形成新的全球民主主義國家聯盟，這些令人想起在冷戰初期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鐵幕演說（Iron Curtain speech）”以及“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7）。在這個時候，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首次推出了“新冷戰”系列（Seth Schindler., Jessica DiCarlo., Dinesh Paudel, 2021）。

第二節 肯定論



關於肯定現在的美中關係為新冷戰的主張，Hung Tran（2021）用 Thomas Christensen 在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裡講到的使得現在美中關係不是「新冷戰」的三個因素，即意識形態鬥爭（ideological struggle）、同盟權力（power of alliances）以及經濟競爭（economic competition）來解釋現在美中關係的輪廓。他認為現在美中競爭關係上明確的有意識形態層面，世界逐漸開始分成兩個擁有不同治理價值觀的集體（groupings），雖然沒有軍事衝突或代理戰爭，但是網絡空間（cyberspace）裡的戰爭行為已經開始，中國實際上為了削弱民主主義之信心，採取俄羅斯式的網路攻擊（internet attacks），¹⁴在經濟方面，西方國家面臨兩難，即如果為了限制中國的影響力，同時會影響到歐美諸國及世界經濟，另一方面，如果與中國簽訂貿易協定、緩和緊張，中國的經濟表現會更好，使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更加難以對付（Hung Tran, 2021; Laura Rosenberger, 2020）。

與此另外的看法，也就是一個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的比較之視角是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t）、權力平衡視角（balance-of-power perspective）（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9）。¹⁵

Christopher Layne（2020）的研究認為第二次冷戰（中美冷戰、Sino-American）可能很快地走進實際衝突。其之所以是因為美國並不是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傳統的大國之間對立，而是視為美國自由主義與中國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對立，給對方國家貼上邪惡國家（evil state）之標籤，導致更不容易讓美國採取接觸政策（engaging），跟邪惡國家難以妥協，容易對立（Christopher Layne, 2020: 347）。

¹⁴ 對此論證 Thomas J. Christensen（2020）認為說勞拉·羅森伯格中國企圖削弱的是香港或台灣的自由民主，而它們是中國長期以來主張屬於中國的領土，在主張中國領土的地方，運作良好的民主比在北美或西歐發展的民主對中共的合法性構成更直接的威脅（Christensen, 2020: 17）。

¹⁵ Thomas J. Christensen（2020）還是認為現在中國還不是全球性的權力（global power），而是地域性權力（regional power），尤其是其軍事方面。他也認為中國已經能夠挑戰美國與其同盟國，並中國還在持續成長，所以他也認為美國是唯一霸權此一想法是有限的（Christensen, 2020: 9; Christensen, 2001）。



Hal Brands and John Lewis Gaddis (2021) 對於「新冷戰」是否開始之爭議，認為現在的美中關係是「新冷戰」，也不是「新冷戰」(yes and no)。作者們認為如果將「冷戰」這個詞作為長期的國際競爭(protracted international rivalry)的話，現在的狀況是「冷戰」關係，過往的有些「冷戰」發展成「熱戰」，則有些沒有。如果將「冷戰」這一詞作為「the Cold War」、將其大寫的話，它指特定的時間(從1945-47 到 1989-91)、特定的敵手(adversaries)之間(美國、蘇聯和它們各自的聯盟)和特定的議題(二戰後的權力平衡、意識形態衝突和軍事競爭)上發生的事情，他們並認為雖然走向兩極化以及專制與民主之間的差異愈來愈明顯等與美蘇冷戰的相似點，不過其背景大不相同(Hal Brands and John Lewis Gaddis, 2021: 10)。

中國與美國已經進入新冷戰，國境利益(benefits of boundaries)而言，如果中國企圖擴大其國境會引起周邊國家的抵抗與焦慮，將國境收縮的話就有可能招來敵國，與此相反，美國則受益於國境，地理條件給了美國混合的霸權，美國可以控制一塊大陸，並不受阻礙地進入兩片廣闊的海洋，用鐵路連結兩片大海，使美國能夠發展軍事工業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中從他們所面臨的大陸合併的企圖中拯救了歐洲人(Hal Brands and John Lewis Gaddis, 2021: 10-12)。美蘇冷戰後的中國內部指導者都學習蘇聯，將馬克思主義轉換為消費資本主義(consumer capitalism)，但同時並不允許民主主義來避免重蹈覆轍，鄧小平在毛澤東後所進行的市場改革鞏固了對於該政權的支持，被認為習近平也繼續走此路線，但是習近平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政策與此相似，尋求混合霸權的，也就是一帶一路是橫跨歐亞大陸的鐵路和公路之網絡，由中國同盟國的港口來支撐印度太平洋以及北極的海上通道(Hal Brands and John Lewis Gaddis, 2021)。

Minxin Pei (2022) 認為，現在的世界情勢是美國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新冷戰」，拜登政府透過 G7 及北約形成了從歐洲到亞洲廣泛的對中俄包圍網，在烏俄戰爭之際透過對俄制裁與對烏克蘭的支援來指揮西方陣營，在東亞深化美澳印日



的戰略連結來牽制中國的擴張，不過美國國內面臨民主主義的危機，共和黨破壞美國的民主主義¹⁶，如果共和黨在議會選舉以及總統選舉大贏的話，美國失去意識形態上的優點，也不利於美中俄新冷戰，守護共同價值的聯繫會轉變為守護各個國家利益的共鬥。

科里沙克（Kori Schake）雖然認為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之間的差異不少，但是也認為冷戰的邏輯在考慮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上還能用到，冷戰的戰略史豐富又多樣，他認為現在的狀況與 1950 年代的冷戰有相似性，也就是經歷過經濟大蕭條與面臨威權經濟強國的經驗與工資停滯和經歷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的狀況有類似性，現在與當時都美國發現面臨著威權主義國家，將現在與美蘇冷戰的比較有助於使美國面臨的問題有一個比例感（sense of proportion）（Kori Schake, 2018: 52）。

¹⁶ 共和黨破壞民主主義的具體例子為在至少 19 個州通過將投票困難化的 34 則州法，總統選舉之前任命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為美國聯邦法庭法官，而九個法官當中六個是保守派，導致司法之獨立的危機（Pei, 2022）。

第三節 否定論



雖然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國學界、評論家以及外交官尤其是當華盛頓採取的措施是加強美國以及其盟友與安全夥伴在東亞的軍事地位時，中國譴責這樣子是美國以“冷戰心態（Cold War mentality）”來對應中國，但是真正的“冷戰心態”是在從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美國企圖限制蘇聯和其盟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接觸，麻痺他們國內經濟以及阻止外交（Christensen, 2020: 6）。從這個觀點來看，在 1978 年中國的改革時代開始之後，美國的市場對中國出口品開放，對中國產業大量投資以及招收很多中國留學生，這些因素對中國的快速成長與技術近代化不可或缺，美國也要求中國在外交上扮演積極的角色，唯一美國企圖阻止中國成為大國的領域是軍事層面，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與歐洲維持禁止同盟國對中國出口武器，並這些在華盛頓對中國的共識從川普當任總統時走向更鷹派（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6）。

美蘇冷戰是包含很多行為者的國際結果（international outcome），並不是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即使該國家很強大，但不能創造冷戰本身，且美蘇冷戰包含在亞洲進行的一系列代理戰爭，形成從 50 年代到 80 年代對人類構成了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 threat）（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7）。現在美中戰略競爭沒有三個美蘇冷戰有的因素。第一個是，美中兩國沒有參與第三國的全球意識形態鬥爭（global ideological struggle）。第二個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被劃分為完全不同的經濟區塊（economic blocks）。第三個是美國和中國都沒有領導對立聯盟體系（opposing alliance systems）（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7-8）。如果中國與美國都領導著對立的、經濟上獨立的同盟國家陣營在對立的意識形態上的話，美中戰略競爭會很快地擴散到各國，像美蘇冷戰時的朝鮮半島的 38 度線、越南的 17 度線或西柏林，不過中國還沒有該能力，中國也除了北韓之外沒有企圖擴散中國的意



識形態 (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11-12)。¹⁷美國與中國而言，從美蘇冷戰結束後，美國比起中國更加意識形態上的修正主義者，美國以及北約 (NATO) 對前南斯拉夫 (Yugoslavia)，伊拉克 (Iraq) 和利比亞 (Libya) 直接軍事介入，透過軍事力量分裂國家推翻政權，在 2005 年聯合國 (UN) 裡美國與歐洲諸國同意國家保護責任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此一概念是在國內外違反人道主義規範 (humanitarian norms) 等時可能會受到國際介入 (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14)。但是，在川普政權不會再有這樣傳統的擴散民主主義的修正意識形態行為，以及川普沒有意圖深化既有的多邊協定 (multilateral agreements)，從此觀點就更難走進美中競爭演變成全球範圍內親美與親中兩個陣營的對立。美蘇冷戰時最初二十年，是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很明確的劃分，但是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國在非洲等國家進行經濟援助等行為會衝突美國與歐洲的修正主義行為，這樣子的衝突也不像在美蘇冷戰時期的衝突 (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15-16)。

俄羅斯綜合國力不及中國，但在政治上與中國比更富修正主義，更積極地對抗美國和歐洲等自由民主主義國家，另外中國而言，在國內是很威權、壓制的，但是與中國有交流的國家的國內結構似乎沒有介入，中國則最關注的是這些國家對中共在國內的持續統治、中國的主權問題以及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的政策姿態，其重要性依次遞增，雖然有這樣子的差異，但是美國將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修正主義的對手，因此美國被指責推動與中國進行新冷戰 (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13-14)。

Jerry Harris (2021) 的研究是霸權陣營 (hegemonic bloc)，即跨國資本主義階級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與中國之間的冷戰背景的分析。他的研究是發現除了意識形態之外，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帶來了新的區域組織和跨國網絡，使得各國能夠逃避西方監督，中國和俄羅斯創造了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等安

¹⁷ 毛澤東過世之後的中國一直想要平壤採取市場改革 (market reforms) 和改革開放，但是如果平壤按照中國進行改革導致美國與其同盟比中國更加歡迎北韓，所以此意識形態出口不會成為新冷戰之基礎 (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12-13)。



全組織（security organization）以及如亞洲基礎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等經濟組織，中國的開發銀行在整個南方世界提供大量貸款，使各國能夠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需求及債務，其結果，中國的活動干擾了西方長期以來對其認為獨立或危險的國家進行約束的特權，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外的貸款破壞了西方治理(Harris, 2021: 47)。

¹⁸ 在另一方面 Iskander Behman（2018）認為，中國在習近平政權時，形成了意識形態的支柱，在他的政權時期，愛國主義重新興起，公眾對美國等民主國家的批評也變得強硬，也就是反西方無名怨憤（anti-western resentment）的民族主義型修正主義（nationalist revisionism），其形成過程是將南海的小島軍事化，對於南韓與蒙古等國家實施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在中國國內民族主義（nationalism）比起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基本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則輔助該民族主義，中國國內的安全保障支出超越國防費，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臉部辨識系統（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的進步使得增強中國國內監控能力，也就是在國內的壓抑變強，恐怕意識形態的污染（ideological contamination），對美國的敵意更加顯現，在這樣子的背景之下美中關係開始被視為新冷戰，但是中國在國際秩序當中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利益而前進的同時，對國際制度建設及國際問題也有貢獻，具體而言，在巴黎協定、聯合全面行動計畫（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扮演積極角色，現在的國際體系並不是由兩個霸權國來定義，而是該兩大國位於相互競爭的聯盟結構和普遍主義體系（universalistic systems of belief）的核心，美國與中國都沒有企圖透過代理戰爭傷害彼此，也沒有企圖對方的崩潰，美蘇冷戰與此並不相同，如果在思考美中關係之際想起美蘇冷戰邏輯可能會導致自我實現預言（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Iskander Rehman, 2018: 5-6; Michael Auslin, 2018: 11）。人權而言，雖然美國以及西歐諸國指責中國侵害人權行為，發揮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正當化作用，但是不能說中國的侵害人權行為是擾亂西方情感的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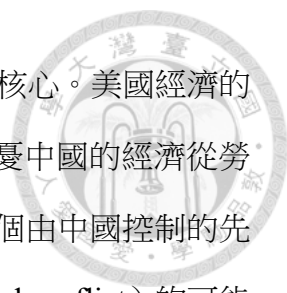
¹⁸ 其貸款的大部分是來自一帶一路，它是為了急需的基礎設施投入了數千億美元，而西方金融機構忽略的領域（Jerry Harris, 2021: 47）。

要因素，因為美國在越南和伊拉克等不少國家進行侵害人權行為，因此人權問題並不是美中衝突的核心，而是裝點門面（Harris, 2021: 48-49）。



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的研究是從太平洋諸島的視角，尤其是吉里巴斯（Kiribati）來分析現在美中關係是否新冷戰，他指出幾個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之間的差異與共同點。差異而言，意識形態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樣。美中之間有明顯的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也就是美國支持自由民主原則（liberal democratic principle），中國則維持共產黨專制以及計畫經濟（managed economy），美國為了美國的發展主動權（development initiatives），在國外促進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等政治價值，因此助長對中國的新敵意的一個因素是中國沒有實施自由主義改革（liberal reforms）、反而以經濟發展來增強權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但是中國也沒有在外交上、貿易上的夥伴試圖說服其他國家採用中國的治理、經濟發展模式，且避免對南方國家的內部事務進行評論（Callahan, 2016; Terence Wesley-Smith, 2021）。此外，中國在美國所控制的經濟、政治秩序裡頭崛起，由鐵幕（iron curtain）分開的美國和蘇聯比起，中國和美國已經很深入的套住，很多國家、連日本、台灣以及越南等與美國戰略聯盟國也與中國擁有貿易、援助投資等聯繫（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75）。另外的不同點是軍事方面。美蘇冷戰包含軍事競爭（arms race），導致古巴飛彈危機，也有在朝鮮半島、印尼以及阿富汗等發生的代理戰爭（proxy wars），但是現在美中關係而言，雖然中國擁有核子武器，不過其狀況與美蘇冷戰不一樣（Lind M, 2018: 2; Talmadge, C., 2018）。¹⁹美中關係裡的軍事層面是不對稱的，且集中在關鍵地區，就是近海周邊地區（near seas periphery）（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¹⁹ 中國將大量的資源投入在擴張、現代化軍事裝備，尤其是在海軍能力，但是中國在 2012 年的第一個航空母艦「遼寧（Liaoning）」是一艘蘇聯設計的老式翻修船。中國在軍事科技裡最顯著的是隱形飛機（stealth aircraft）的發展，它的機能可與美國機型並肩，網絡戰（cyber warfare）能力也不斷地增強（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76）。但是在 2018 年，美國的軍費是北京的 2.5 倍（SIPRI, 2019）。



這些軍事層面背後有經濟的發展，且經濟發展是美中競爭的核心。美國經濟的相對衰退使得美國更擔憂技術上的優勢衰退，也就是美國在擔憂中國的經濟從勞力密集工業（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為基礎的經濟轉換為一個由中國控制的先進技術驅動的經濟，而這樣子的趨勢與看法增加武裝衝突（armed conflict）的可能性。（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77; Laskai, 2018: 2）。

此外，Michael Lind（2018）認為一般而言美蘇冷戰與所謂新冷戰之間差異點相較相似點來得多，美蘇冷戰時中國是蘇聯的小夥伴（junior partner），在 1980 年代中國成為實際上的美國同盟，但是在新冷戰裡中國成為對美國最強大的存在，俄羅斯衰退以及成為中國的投機取巧的同盟，美蘇冷戰是大國間鬥爭（great power struggle）以及意識形態上的鬥爭，但是新冷戰是比較傳統的大國間鬥爭，雖然其他國家模仿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也歡迎與中國貿易和投資，但是在海外沒有支持宗明理學（Neo-Confucianism）和毛澤東威權主義，除了這些以外最大的美蘇冷戰與新冷戰之間的差別是軍事力與貿易政策間的關係，在美蘇冷戰的時候從 1940 年代到 1980 年代這兩件事情是獨立的，雖然蘇聯受到嚴厲的經濟制裁，但是蘇聯幾乎都自給自足，所以當時美國與其同盟國為了影響到蘇聯經濟的主要手段為軍事競爭（arms races）之成本，另外方面，美國為了同盟的聯繫將自己的市場開放給其軍事保護國（military protectorates），尤其是日本、韓國以及台灣等增加對美國產業有損害的重商主義貿易，這樣子原本軍事政策與貿易政策分開，但是到了川普政權國防部建立對中國的戰爭計畫（war plans），商務部歡迎美國的跨國公司將其產業基盤移出中國，此一圍堵政策（containment）與接觸政策（engagement）被稱為“congagement”（Michael Lind，2018）。現在新冷戰而言，美國有四個戰略選項，一個是戰術性綏靖主義（tactical appeasement）、²⁰推回政策（rollback），²¹圍堵政策以及緩和政策（détente），其中圍堵政策的目的為以比對方更強的立場來交涉對自己有利的緩和政策，雖然經濟政策不會替代軍事政策，但是其重要性增加了，

²⁰ 在此作者認為綏靖主義，也就是美國撤退到北美不會帶來利益給美國（Michael Lind，2018）。

²¹ 在此作者認為推回政策是無效的，因為中國不太會從南海撤退（Michael Lind，2018）。

在美蘇冷戰時蘇聯是軍事對手，而不是商業對手（commercial rival），日本是商業對手，而不是軍事對手，但是在新冷戰，中國又是商業對手，又是軍事對手，因此美國需要使用軍事、外交以及貿易三個方面的戰略（Michael Lind，2018）。

中國而言，這些事情被視為美國阻止中國成為強權，中國的軍事增強被視為防禦性（defensive）的，其大部分是都中國為了確立重要貿易航線之控制權（vital trade route）來持續經濟成長，也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中國為了對抗美國在日本、韓國、關島、新加坡以及澳洲的美軍基地包圍網（encircling network of US military）以及來自菲律賓等其他國家的集結待命地區（staging areas）、美國支援武器給台灣等。從此可以看到美中之間的對立並不是關於意識形態上的，而是中國對於現狀（status quo）的挑戰是有選擇性的（selective）、複雜經濟和政治層面重疊的競爭（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77-78）。另外，經濟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此外在包含太平洋諸島的發展中世界（developing world）的追求影響力競爭中主要手段是經濟發展的承諾（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78）。²²

為了控制領土的零和地緣政治競爭激發了美蘇冷戰，從杜魯門政府（Harry S. Truman）到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以遏制蘇聯為主；蘇聯外交政策是防止資本主義之包圍（capitalist encirclement），相比之下現在美中關係裡的特點是地緣、經濟上的競爭，以整合領土和建立區域夥伴關係，其中具體型態有生產、貿易網絡之擴張及深化，鐵道、高速公路以及能量網絡等跨國基礎設施等（Seth Schindler., Jessica DiCarlo., Dinesh Paudel, 2021: 322）。

Seth Schindler., Jessica DiCarlo., Dinesh Paudel（2021）也認為，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之間的差別就是蘇聯在二戰之後經濟不振，美國則在二戰時經濟快速成長，美國阻止蘇聯與其他國家建立商業關係。現在美中關係而言，中國的 GDP(PPP) 已超越美國，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並不想要遏制中國，美國與中國在不少方面有協

²² 其中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不一樣的是隨著氣候變遷危機的情況下雖然在 2015 年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簽訂，所以雖然在需要減少、遏制排放二氧化碳的同時也在追求經濟發展的狀況（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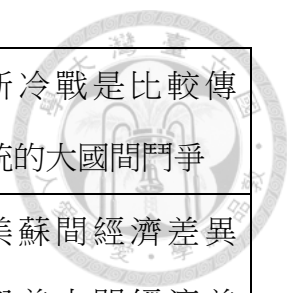
作關係，美國試圖以獎勵來中國融入美蘇冷戰結束後的單極世界並對於侵略行為，企圖讓中國付出代價。



小結

表 1 美國學界的看法

名字	機構	肯定/否定	主要理由
Hung Tran(2021)	Atlantic Council	肯定	不同意識形態的兩個集體以及網絡空間裡的戰爭。
Christopher Layne(2020)	Texas A&M University	肯定	美國將美中對立中關係視為自由主義與中國共產主義間的意識形
Brands and Gaddis(2021)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部分肯定	雖有兩極化、意識形態上差異明顯，但其背景大不相同
Minxin Pei(2022)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肯定	美國對中俄行程包圍網
Kori Schake(2018)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肯定	現在美中關係與1950 年代美蘇關係間有相似性
Thomas J. Christensen(2020)	Columbia University	否定	現在美國要求中國在經濟及外交上扮演重要角色
Terence Wesley smith(2021)	University of Hawai	否定	雖然意識形態上有差異，但其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樣



Lind M (2018)	University of Texas	否定	新冷戰是比較傳統的大國間鬥爭
Seth Schindler., Jessica DiCarlo., Dinesh Paudel(2021)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colorad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否定	美蘇間經濟差異 與美中間經濟差異之不同
Iskander Rehman(2018)	Salve Regina University	否定	中國在國際秩序裡扮演重要角色
Michael Auslin(2018)	Stanford University	否定	美中間的經濟相互依賴

在美國的學術界裡，關於現在美中關係是否新冷戰之討論，贊成美中關係已經是新冷戰的主張比較少，而否定的主張比較多。肯定的主張而言，其主要判斷基準有三個。

第一個是意識形態鬥爭。具體而言，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中國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也分成兩個具有不同治理價值觀的集體，經濟競爭，雖然沒有像朝鮮戰爭以及越南戰爭等代理戰爭，但是在網絡等科技上也有競爭關係。

第二個是經濟競爭，西方國家在此面臨兩難，也就是限制中國經濟的話一定會影響到西方以及其他全世界的經濟，但是如果支援中國的話中國的影響力會增加，更難以對付。

第三個是陣營或集體，拜登政府透過 G7 以及北約形成對中俄包圍網，在烏俄戰爭時透過制裁俄羅斯以及支援烏克蘭來指揮西方陣營，在東亞深化美澳印日的戰略上聯繫來牽制中國。

否定的主張而言，其主要判斷基準有七個。



第一個是真正的冷戰心態是美國企圖限制對方與其他國家間的經濟接觸，而甚至麻痺其國內的經濟與外交，但是現在的美中關係而言，在經濟領域以及外交上美國都要求中國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二個理由是冷戰是一個不同行為者之間的國際結果，不是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

第三個理由是現在的美中關係裡沒有參與第三國的全球意識形態鬥爭，美中之間雖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美國擁有自由民主原則，中國則擁有共產黨專制以及計畫經濟，美國在國外推進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等政治價值，但是中國沒有對外推進中國的治理方式、經濟發展模式等。

第四個理由是現在的世界已經高度全球化了，難以劃分為像美蘇冷戰般的不同經濟區塊，也沒有對立的聯盟體系，加上因為川普是沒有意圖深化既有的多邊主義，推進「美國優先」政策，也不會將民主主義推進給其他國家。此外，中國是在美國所控制的經濟、政治秩序裡崛起，由鐵幕分開的美蘇關係比起，中國與美國已經套住，也很多像日本、台灣以及越南等美國戰略聯盟國間貿易等關係。

在此，雖然 Thomas J. Christensen 認為如果美中都領導對立的、經濟上獨立的全盟國家陣營在對立的意識形態上的話，美中戰略競爭會很快地擴散到各國，但是現在美中開始脫鉤，這樣子的話美中之間的國家也是否開始逼迫選邊？

第五個理由是將俄羅斯與中國相較起來俄羅斯政治上更加修正主義，也更積極地對抗美國以及歐洲等自由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中國雖然對國內很威權、很壓制的，但是似乎沒有介入其他國家，中國則關注的是其他國家對中國在國內的統治、主權問題以及這些國家與中國間的經濟合作的政策，因此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美國之修正主義對手是錯的。但是中國是否修正主義是應該更有角度可以探討，也就是中國與香港或台灣等關係以及中國與南海上的國家關係的角度？

第六個理由是雖然除了意識形態之外，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帶來了新的區域組織以及跨國網絡，而在能夠避開西方管控的同時，中國的開發銀行在南方世界提供大



量貸款，使各國能夠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而中國干擾西方治理，但是中國對國際制度建設以及國際問題也有貢獻，現在的國際體系並不是由兩個霸權國來定義，而是該兩大國位於相互競爭的聯盟結構和普遍主義體系的核心，美國與中國都沒有企圖透過代理戰爭，傷害彼此，在此現在美中關係與美蘇冷戰並不相同。

第七個理由是軍事競爭，美蘇冷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軍事競爭，其導致古巴飛彈危機以及其他代理戰爭，但是現在美中關係而言，雖然中國也有核武，但是其狀況與美蘇冷戰不一樣，美中之間的軍事力量是不對稱的，而且其集中在近海周邊地區等的關鍵地區。

這樣來看的話，在美國學界肯定論裡面主要關注意識形態對立，但是對其他因素的描述比較少。美國學界否定論裡面也有主張承認美中間有意識形態對立，但是也主張其他因素，除了意識形態之外的部分，如經濟以及軍事力等與構成美蘇冷戰的因素大不相同。

第三章 中國學界的看法



第一節 「新冷戰」爭議出現的背景

關於「新冷戰」的出現，趙慶寺（2018）認為在美蘇冷戰時期有美國與蘇聯的兩大軍事集團，雖然它們都企圖避免升級到熱戰，但是雙方都透過政治對抗、經濟封鎖、軍備競賽以及文化滲透等“冷戰”方式來對峙與競爭，美蘇冷戰結束之後，世界面對如國際形勢呈現初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為基本特徵的起伏狀之衝突與危機，各種「新冷戰」的概念開始傳播，²³尤其是從 2014 年的烏克蘭危機之後“新冷戰”通常都是指俄羅斯，後來中美之間的實力接近使得美國衝心考量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尤其是川普上台之後開始重新定義美中關係，在此時美中新冷戰話語成為干擾和衝突美中關係的重要思潮，因為西方社會為了認識現實威脅，建立競爭對手，強化內部團結，所以“新冷戰”話語尤其是在西方社會流行，其擁有“修昔底德陷阱”以及“銳實力”等大國對抗的理論與戰略政策（趙慶寺，2018：28-29）。他認為這個新冷戰話語是擁有邏輯以及體系，也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一直尋求新的敵手，企圖將中國作為對它們的威脅，在 2017 年底以來，透過智庫協作政府、同盟國行動協調以及跨部門密切合作等渠道，美國發起了“新冷戰”話語的新一輪攻勢，也就是美國桎梏國家民主基金會發布的「銳實力：上升的威權主義影響」，其內容為將“銳實力”定義為威權政府為了在目標國家的政治信息環境裡提升自己國家的影響力，通過媒體、學術界、文化界以及智庫來滲入或穿透其目標國家的現象，其主要國家為中國與俄羅斯，接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銳實力：中國影響力的新型態」裡指責中國利用文化與價值觀的誘導來強化國家之銳實力，對此觀點趙慶寺認為銳實力此一概

²³ 他指的各種新冷戰為第二次冷戰、冷戰 II、冷戰 2.0（new cold war, the second cold war, cold war II and cold war 2.0）（趙慶寺，2018：28）。



念式西方國家為了體現自身話語權之優勢，只針對威權國家的負面軟實力概念，再來美國應派政客、反中議員、保守智庫等主張中國進行“海外干涉”行為，將中美貿易摩擦擴及到政治、安全、軍事以及外交等領域，到了 2018 年 6 月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海外的干涉行動：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應該如何應對』分析中國在澳洲、紐西蘭以及美國的“干涉行動”，在同年 8 月時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發布「中國海外統戰工作：背景和對美國的影響」也探討中國尤其是在美國的影響力以及潛在威脅，同年 9 月威爾遜中心發表了「中國在美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影響力與干預活動的初探研究」，同年 10 月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了「中國的影響力行動正在針對美國的弱點」，如此美國智庫密集發佈中國在海外影響主題之報告（趙慶寺，2018：30-31）。

宋鷺、孫巧鈴、李欣潔(2021)認為在美國歐巴馬第二任期(2013 年到 2017 年)的時候，格蕾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美中關係的“修昔底德陷阱”²⁴，而約瑟夫·奈(Joseph Nye)、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知名專家關注此一議題，帶頭美國學界與媒體討論「新冷戰」等問題。同樣歐巴馬政府時期的 2010 年以來在美國產生了對中國政策的大辯論，美國而言新的華盛頓共識已經形成了，而中國是美國的全球性的戰略競爭對手（趙慶寺，2018：31）。這些美國學者。因此，他們總體來看，以布魯金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哈德遜研究所、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以及美國進步中心為首的美國知名智庫普遍認為美中對抗是不可避免的（宋鷺、孫巧鈴、李欣潔，2021：55）。他們的研究是從美國的智庫來分析美國對華政策。其主張是川普當選總統之後，其不同於傳統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派”風格導致美國國內外政策發生巨變，對華政策領域的“冷戰化”特點更為明顯（宋鷺、孫巧鈴、李欣潔，2021：53）。

²⁴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黃忠（2022）認為，美中新冷戰的背景為川普上台之後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在政治、經濟、安全以及人文交流等領域進行對抗中國之行為，同時，中國的崛起引起是否中國會身為霸權國之美國挑戰，能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黃忠，2022：77）。趙可金（2020）也認為 2017 年年底時美國川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報告」以及「印太戰略報告」等戰略文件來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以及“修正主義大國”加上副總統麥克彭斯、麥克澎佩奧和彼得納瓦斯在各種場合譴責中國以後中美關係特別引起國際社會之擔憂，並憂慮世界可能陷入“新冷戰”（趙可金，2020：15）。到了 2018 年以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一些美國主流媒體開始將美中陷入一場“經濟冷戰”，隨著美中貿易摩擦升級，「新冷戰」佔據了上風，在 2019 年經濟學人雜誌（趙可金，2020：18）。

Minghao Zhao（2019）在 2017 年川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說美國進入大國競爭的新時代，將中國視為創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與利益相悖的“修正主義勢力（revisionist power）”及“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此外在 2018 年的國家防衛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說作為國防部和新挑戰（central challenge）是如何應對中國與其他對手國家出現的長期戰略競爭，美國高級官員也表明競爭已經成為川普政府之中國政策的焦點，其具體政策為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爭，而美中經濟關係走向脫鉤（decoupling）。

喬·拜登（Joe Biden）當美國總統之後，美國戰略界對華政策的“新冷戰化”趨勢加劇（宋鷺、孫巧鈴、李欣潔，2021：53）。

川普在任期間，中美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國大選等重大事件接連發生，美國智庫對中國問題、中美關係以及相關地緣政治、經濟型態的認識都有顯著變化（宋鷺、孫巧鈴、李欣潔，2021：53）。在經濟方面，川普政府重視美國本土經濟，美國對於中國貿易採取保護主義政策並發動中美貿易戰。在政治方面，川普政府明確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



Guo Shuyong、Li Boran（2021）也認為從川普政權時其美中關係開始惡化。雖然從 1980 年代末美中關係有衝突，但是基本上穩定，這是因為美中關係和解（normalization）以後美國的對中政策為接觸（engagement）政策，到了川普政權以後，一開始美中關係上設立 4 個高層對話機制（high-level dialogue mechanism），即外交與安全保障對話、執法（law enforcement）與網絡安全對話、社會與文化議題對話以及全面經濟對話（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但是在 2017 年川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 2018 年兩國對立擴及到貿易、金融、技術、開發模型、意識形態、海洋安全保障以及香港、新疆問題等，新冠疫情也沒有促進兩國協作，反而導致緊張局勢的大幅升級（Guo Shuyong、Li Boran，2021：2-3）。

田飛龍（2021）認為，美中貿易戰是新的中美關係的起點。該關係的趨勢為新冷戰。所以他認為川普主義加速了美中關係變質的進程。在美中關係的變質的同時發生的是西方缺失。

黃忠（2022）指出，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發言說，美國一些政治勢力試圖把中美關係推向所謂「新冷戰」，²⁵此外，在中國有一個針對 100 名中國學者的問卷，它的結果為其中 62% 的中國學者認為美國真的在對華發動「新冷戰」。²⁶

美國對中國的定位一直變化，川普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以及最大戰略競爭對手，蓬佩奧將美國視為最大敵人，拜登政府卻修正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的川普政權之看法，並認為中國是頭號競爭對手，與此相反，中國則一直想要與美國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黃忠，2022：80）。

綜合上述，中國對於「新冷戰」的出現之看法，整體來看美中雙方性的「新冷戰」並還沒有開始，但是約一半以上的學者認為美國已經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其中「新冷戰」隨著 2018 年的美中貿易戰而來的看法較多。其中一個重要的事情是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在 2018 年 10 月 4 日在哈德孫研究所發表的演說。該場言

²⁵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zb/gov/wzjzh/wzsl.htm>

²⁶ <http://rdcy.ruc.edu.cn/zw/yjcg/yjcgjybg/yjbgjybg/898281a9cb004138a15193c38b3c55b6.htm>

講被不少人認為新的“鐵幕”演說²⁷，意味著美中「新冷戰」的開始（趙可金，2020：18）。

陶文釗（2021）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在川普任內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美中關係遭到破壞，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美中關係陷入了「新冷戰」。

章百家（2020）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現在的美中關係，雖然從在 2010 年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國家時美中關係開始邊逐漸分開，在重要議題上邊維持著合作關係，但是到了 2017 年川普政權時，中國想要與美國建立合作關係，不過美國改變了對中政策，宣言說中國是戰略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及競爭對手（competitor），美中關係面對的問題包含經濟和貿易上不和、在產權上的爭端、技術脫鉤（technological decoupling）、香港、台灣問題以及南海爭端，且從 2020 年 COVID-19 之後兩國關係再快速惡化。

²⁷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October 4, 2018 at Hudson Institution.

第二節 肯定論



楊奎松（2019）認為，如果將冷戰的本質為社會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兩種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制度之間的競爭的話，不能說“冷戰”已經結束了，因為只要有該兩種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制度對立，而所有人都不希望熱戰的話，冷戰是不可避免的（楊奎松，2019：170）。

楊勇萍、潘迎春（2021）的研究先指出美蘇冷戰的定義具有的四大標準，即全面對抗、意識形態對立、兩大陣營以及經濟脫鉤，他們的結論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和政策已經顯著地趨向「新冷戰」（楊勇萍、潘迎春，2021）。美國對華政策走向「新冷戰」的原因是經濟權力競爭以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競爭的雙重考量，在權力、制度與文化三方面競爭效應長期累加的結果，此外，不管是川普政府或拜登政府，權力、制度和文化方面的矛盾沒有消解，因此美國對華戰略都會趨向「新冷戰」戰略（楊勇萍、潘迎春，2021：82）。

關於「新冷戰」的定義，楊勇萍、潘迎春（2021）將「新冷戰」定義為「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非暴力衝突狀態」，並「新冷戰」的三大標誌與特徵為「強烈的對抗性、非直接的暴力性以及意識形態的對立性」，其中強烈的對抗性以及非直接的暴力性體現權力以及它在「新冷戰」中的運用方式。意識形態的對立性體現的是觀念和其制度載體在「新冷戰」中的特殊地位作用（楊勇萍、潘迎春，2021：81-82）。

此外，他們有五點結論，第一點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實際上是美國對中國的“新冷戰”前奏曲，因為它體現美中之間經濟議題的權力競爭，以及表現兩國基於不同發展模式的制度競爭，第二點是在國際貿易體系改革方面，美國、日本和歐洲盟友圍堵“中國道路”，並通過設置“毒丸”條款來排擠中國，其主要原因是經濟權力競爭和其背後的意識形態競爭。第三點是新冠疫情加速了美中在權力與制度上的競爭，而成為美國對中國“新冷戰”攻勢的突破口，第四點是因為制度失靈衝擊了其文化自信，西方國家政府、媒體乃至學界不得不通過設計和編造“疫情敘事”

的方式對中國展開攻擊，第五點是西方國家傲慢的文心優越感不僅延誤了本國的疫情治理，而且最終因為西方抗疫失敗而毒化了國際關係的正常氛圍（楊勇萍、潘迎春，202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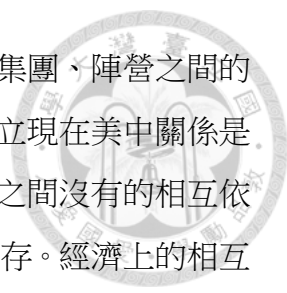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否定論



趙慶寺（2018），「新冷戰」無論是美俄或美中都是根據美國以及西方國家對中俄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選擇充滿各種偏見甚至敵視（趙慶寺，2018：29）。他雖然認為川普政府有意與中國脫鉤和全面競爭，並用了「新冷戰」號角，但是作者將「新冷戰」作為一項長期的對華戰略，從美國國內而言，在共和黨內部、共和黨與民主黨、菁英與民眾之間在對於中國政策上仍然存在著分歧，為形成對中政策上的共識，此外，川普並沒有重視國際協議，政策容易變化，美國同盟國之歐盟、日本以及澳洲等國家不會跟隨川普政權對中國實施的圍堵中國之政策，在此其他國家企圖美國從中國市場退出之際，趁機會替代美國並擴展中國市場，期待跟者中國的發展速度，對於這些美國對中國政策，中國也不會針鋒相對，致力於避免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從國際角度而言，現在各國之間利益關係很深，因此“新冷戰”思維是當代國際關係的非主流（趙慶寺，2018：37）。關於美中關係是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討論，蔡翠紅（2016）並不認為現在美中關係符合“修昔底德陷阱”，他認為西方將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擴大化使用的三個傾向，一是普通的國際關係競爭與衝突，大國之間的競爭與衝突是世界政治的常態，並不一定會導致戰爭，二是現實主義觀點裡的“安全困境”，在國際體系裡普遍存在的權力結構再分配所導致的國家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此現象不僅發生在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家，國際關係理論裡的霸權爭奪理論、霸權衰落理論以及權力轉移理論等都認為中美衝突不可避免，因此“修昔底德陷阱”變成現實主義學派擴大詮釋“安全困境”的一個工具、三是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話語，雅典與斯巴達雙方國家都擁有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發生原因，也就是崛起國家實力的快速發展以及霸權國家的恐懼都是產生衝突可能性的原因，但是西方有目的的將中國威脅論擴大為修昔底德陷阱，即話語策略（蔡翠紅，2016：16-18）。

趙可金（2020）站在現在美中關係不是「新冷戰」關係的立場，並主張該兩國以後也不可能走向「新冷戰」方向，他認為現在美中關係進入了“軟戰時代（soft war era）”，其意思就是軟性政治的分界線而展開，在此時代“有道義”、“有道理”是“有力量”之根據，本質上不是戰爭，也不是對抗性狀態，而是在一種合作競爭、在競爭中合作的複雜博弈（趙可金，2020：15-22）。



陶文釗（2021）從美中相互依賴、意識形態之間的對峙以及集團、陣營之間的對峙之有無來討論現在美中關係是否「新冷戰」，並認為難以成立現在美中關係是「新冷戰」的看法。他這樣子認為的原因是現在美中之間有美蘇之間沒有的相互依存。該相互依存有兩大類，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和非經濟的相互依存。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又可以分為雙邊的和多邊的。經濟上的雙邊依存而言，中國在 2011 年成為美國第一大貨物進口來源地、第二大貿易對手、第四大貨物出口市場，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在全球上占據重要地位（陶文釗，2021：26）。川普當任美國總統發動美中貿易戰，主張脫鉤，但是脫鉤是市場行為，改變市場行為是需要市場之主體的企業來做，不過中國擁有 14 億人口的巨大消費潛力對企業有相當吸引力（陶文釗，2021：26）。

張文本（2018）認為新時代中美競爭本質是制度競爭。他認為川普政府將該政權的政治基礎從以往的石油美元轉移至軍工美元，美國的敵人為世界和平，因為戰爭產生美國的利益，相比之下，中國提高國際道義之制高點，並追求世界和平，這樣子的兩國之間的差異是兩國制度的矛盾，在該矛盾結構當中，關鍵的是壟斷財團，美國而言是華爾街國際壟斷資本所獲的剩餘價值率等（張文本，2018：5-6）。在美國經濟霸權逐漸衰退的同時，美國的軍事力量仍然強大，這樣子的狀況帶來的風險是美國新保守派支持在國際事務上以軍事力來解決問題，傾向容易發動戰爭，與此類似的情形，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使得美國軍工業成為美國製造業的核心，到了 2015 年美國軍工業一年的總收入佔了美國製造業之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一直以來支撐此美國收入的是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在 2018 年美國的失業率降到 2000 年以來最低的水平，這是由軍工生產大規模開工造成來的（張文本，2018：6-7）。另外，張文本（2018）指出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新冷戰」的看法缺乏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該矛盾就是現在的華爾街集團資本收益與支出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此時比以前腐朽性更加出色，反動性與窮兇的特點，此外，如果中國默默地承認新冷戰概念的話，其代表中國與西方陣營以及美國的對立，將敵人趕到那一邊去（張文本，2018：7-9）。



新時代的世界政治擁有獨特特徵，也就是南北矛盾已經激化，壓迫民族內部也已經分化地嚴重，中國外交的主要對為帶有壟斷資本特點的金融帝國主義，在此借用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來分析目前的國際情形，以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的視角來看，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之美國與作為民族國家之美國分開地想（張文木，2018：9-10）。

章百家主張中國與美國會面臨結構上的爭執，相互較勁是不可避免的，COVID-19 與川普政權所採取的措施沒有為政策調整留下緩衝區，其特徵是美國想要維持全球主導地位，中國則想要維持自己的發展之權利（Baijia Zhang，2020：10）。美國而言，基於三個考量將中國定義為戰略對手，其中最重要的考量是中國的發展會挑戰美國全球領導，第二是美國的參與政策（engagement policy）的失敗，第三是美國認為中國是對現在全球體系的修正主義者，其結果美國將經濟與貿易爭執和高科技競爭高度政治化，將 COVID-19 作為對抗中國的工具（Baijia Zhang，2020：10）。從中國的視角而言，加快發展以及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socialist modernization）是中國一直想要的東西，但是中國並沒有取代美國的意圖和能力，中國相信現在國際秩序與國際治理體系還有改善的空間，美國的行為實際上更似修正主義者，關於是否現在的美中關係走向像美蘇冷戰般的零和遊戲，其可能性和美中能避免此狀況的可能性都有（Baijia Zhang，2020：10-11）。現在美中關係與美蘇冷戰之間有三個差異，第一是緊迫的問題並不是二戰後的重建，而是改革與調整現在的世界秩序，其需要中國和美國都參與，第二是美蘇冷戰發展成零和遊戲的主要原因是兩國為了爭奪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優勢而對抗，美國和蘇聯都將彼此視為邪惡的國際勢力代表，敗給對方意味著毀滅，但是現在美中關係而言，所謂的“中國模式（China model）”只針對某些國家呼籲，在意識形態上中國一直強調中國承認不同國家能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美國則準備好出口其意識形態，最後是由美蘇冷戰產生美國和蘇聯各主導的兩個經濟體系，但是現在美國與中國都在一個

經濟體系內共存，兩個平行的經濟體系間的鬥爭與一個經濟體系內的鬥爭在形式上、內容上大不相同（Baijia Zhang, 2020：11）。

黃忠（2022）對於現在美中「新冷戰」爭論指出，主張此一主張的人主要在政界以及國際關係學界的專家和學者較多，冷戰史學者的看法比較缺乏，²⁸因此認為冷戰與新冷戰的比較只是簡單的表象特徵層面，基本特徵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冷戰的起源也沒有得到重視，冷戰史學理也有幾個學派，²⁹因此很難去比較美蘇冷戰與「新冷戰」，但是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作者還是認為當前中美關係不符合冷戰的定義，作者以體系、國家以及人這三個層次的分析來比較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國際體系而言，蘇聯當時的 GDP 為美國的三分之一，雖然軍費是美蘇之間差異與其他國家相對來不大，但是該兩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在軍事上的差距非常大，³⁰共產主義陣營而言，戰爭與經濟衰敗提供該陣營在歐洲擴大影響的機會，資本主義陣營而言，二戰的結束削弱了傳統殖民主義並在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提供資本主義擴大的機會，此外，地緣經濟、政治與安全利益衝突使得美蘇走向對抗，杜魯門政府認為經濟能力決定一個國家的權力，甚至軍事鬥爭之結果，因此，美蘇冷戰時的美國為了維持並擴大其經濟能力，推動馬歇爾計畫並將蘇聯與其他國家之間簽訂的雙邊經濟協議視為對美國的威脅，³¹這樣子的經濟對立有助於政治安全上的對立，在此狀況之下，在歐洲美蘇最關心的是德國的崛起與它會站在美蘇哪方面，另外方面，在亞洲受到最大關心的是日本，德國而言，主要各國各自對德國戰後的利用價值擁有理想並這些利益對立產生各國之間的相互不信，美國對德國實施的

²⁸ 這樣子的狀況產生的具體問題是國際關係學界與決策界傾向於將事情簡單化理解而產生錯誤（黃忠，2022：81）。

²⁹ 美國學術界裡面而言就主要有三個學派，其中正統學派認為首先挑起冷戰的是蘇聯，認為美國首先發動冷戰為修正學派，美蘇兩國都是發生冷戰之原因為後修正學派，則在中國冷戰史學界受到恩格斯歷史合力論（Historical Resultant Theory）的影響，引此較多學者認為美蘇冷戰是很多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黃忠，2022：81）。

³⁰ 1950 年美國的軍費與軍隊數量為 145 億美元、138 萬人，蘇聯的軍費與軍隊數量為 155 億美元、430 萬人，其他國家譬如英國為 23 億美元、68 萬人，法國為 14 億美個、59 萬人（黃忠，2022：84）。

³¹ 馬歇爾計劃的目的為在歐洲能夠擴大美國市場、出口以及能獲得原材料，而有助於避免美國經濟衰退，同時，因為蘇聯與東歐諸國之間的雙邊協議意味著蘇聯的經濟發展，甚至發展其軍事力量，歐洲諸國也無法從這些國家進口（黃忠：2022：84）。



措施為成立西德政府、發行新貨幣以及實施西柏林市政選舉等，對於這些美國的行為，蘇聯封鎖了柏林水陸交通、發行東德馬克等，經過這樣子的過程後來發生第一次柏林危機，甚至德國分裂，在歐洲的冷戰開始，在亞洲，美國希望中國與蘇聯的分裂，蘇聯與中國結盟之後，美國而言蘇聯的威脅增加，與此同時日本、朝鮮半島、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對美國的戰略意義相對的增加，意識形態方面而言，此因素也促進美蘇兩國在經濟、政治與安全等領域上的對抗，並給予美蘇兩國的冷戰政策正當性，美國二戰後致力於對外宣傳意識形態，針對共產黨國家發動心理戰，蘇聯則認為兩次世界大戰都由邪惡的帝國主義發動的，西方的意識形態才是威脅，西方國家的行為與理念之間有落差，擁有雙重標準，斯大林認為這些國家與法西斯主義國家之間沒有本質上差異，這些美蘇兩國之間文化心理認知上差異使得該兩國外交上產生不少誤解，簡言之，經濟利益衝突沒有緩和的狀況之下，政治安全領域上的對抗也加劇，意識形態與文化心理上的差異加強彼此間的敵意，擁有核武器不敢發動戰爭而產生冷戰（山本健，2021：62；黃忠，2022：）。在這樣子的分析上黃忠認為中美難以進入“新冷戰”，因為冷戰的正式開始的標誌是德國分裂與朝鮮戰爭爆發，再來蘇聯與美國正式開始對抗，則現在中美之間的經濟、科技、意識形態戰而言與美蘇冷戰對世界的影響程度很不一樣，雖然中美兩國以外其他國家在經濟與軍事方面上難以趕上該兩國，但是從軍費佔國民生產總值（GNP）之比重來看的話，與其他國家的比重相對來也並不高，中國的比重為 1.7%，也就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則大部分國家的該比重為 2.0%左右，³²從核武器數量來看，在 2021 年 1 月時美國擁有的核武是 5550 枚，俄羅斯擁有 6255 枚，中國擁有 350 枚，其他國家都 300 枚以下，其中世界公認的核武器超級大國為美國與俄羅斯，中國並沒有被包含，雖然某種程度之下，國家一擁有了核武器，就有了國際體系裡生存和自主

³² 他的主張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其預測為美國 GNP 在 2021 年 22.9 萬億美元，中國為 16.8 萬億美元，第三名之日本為 5.1 萬億美元，軍費而言 2020 年的美國軍費是 7782.32 億美元，中國是 2523.04 億美元，第三名之俄羅斯是 617.13 億美元，因此確實美國和中國之外的國家難以趕上該兩國，軍費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重而言，美國是 3.7%，中國是 1.7%，日本是 1.0%，澳洲是 2.1%，俄羅斯是 4.3%，法國是 2.1%等等（黃忠：2022，89）。



決定外交政策的資本，其代表性例子為北韓，它因為擁有核武器，在國際體系裡面，不會受到如伊拉克或敘利亞的對待，此外，另外個重要的指標是軍隊實戰能力，美蘇兩國都經歷過二戰，而擁有同一水平的軍隊實戰能力，但是中國並沒有這樣子的經驗，因此中國與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不一樣，歐美西方國家真正要處理的威脅並不是社會主義或中國，而是民粹主義，此外，氣候變遷與新冠疫情等非傳統的安全議題之重要性提升，國際社會傾向於彼此合作去解決這些問題，也就是和平與發展為目前國際社會的目標，並不希望發生新冷戰，也沒有新冷戰，³³在經濟層面而言，雖然美中之間有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但它的範圍只限於追求發展權領域內，並沒有涉及到國家生死存亡，此外，在美蘇冷戰時期全球經濟體分成兩塊，但是現在的世界裡全球統一經濟體系已經形成，在其中中國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美蘇冷戰時期美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控制世界主要資源產地，是因為二戰之後美國無法滿足美國國內的生產力需求，則現在的美國面臨的經濟問題為金融資本過於強大以及產業的空心化，在這樣子背景之下，如果美國真的要對中國發動新冷戰的話，美國停止對中國出口的石油，但是仍然美國中國第四大原油進口來源國家，中國也可以利用中國對美債券的投資來造成美國財政問題，但美中兩國沒有實施這些選項，加上，美中貿易戰之後也美國大部分的州與行業從對中國出口受到利益，也就是美國政府是競爭、對抗中國的，但是美國企業並不支持此一政策，甚至遊說政府緩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最後，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沒有逼迫其他國家去模仿中國模式的政權，也堅持不會與周邊國家結盟對抗美國，沒有對美國造成任何威脅，中美之間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而言，該兩國之間的意識形態上差異也並沒有造成威脅，與蘇聯比較也中國沒有透過共產黨情報局控制其他共產黨，中國擁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沒有對外輸出意識形態，中國周邊國家也沒有感覺到中國以意識型態來的威脅，中國對於美國而言，中國批判美國其霸權主義、強

³³ 法國擁有 290 枚，英國擁有 225 枚。

權政治、單邊主義和偽多邊主義等，但是還是總體來和中國堅持包容的態度，這些現象在美蘇冷戰時並沒有發生過（黃忠，2020：88-92）。

Guo Shuyong、Li Boran（2021）認為因為有三個因素中美冷戰是可以避免的，第一個是中美冷戰裡沒有“政治基礎（political basis）”，美蘇冷戰是由國際體系結構來產生，國際社會的分裂為冷戰奠定了冷戰之政治基礎，比起這樣子的美蘇冷戰，現在的國際體系裡更多穩定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的出現使得現在的國際體系為多極體系。

第二個是中美冷戰裡沒有“經濟基礎（economic basis）”，兩國之間的經濟依賴程度極高，無法承受冷戰的爆發，對於中國而言美國是重要的海外市場，對美國而言也與中國的貿易與經濟帶來利益給美國經濟與消費者，雖然在特定的地方中美在脫鉤，但是該兩國無法完全地脫鉤，因為在 2020 年中國提出了「雙循環（Model of Dual-Circulation）」，意味著中國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政策，並期待包含美國的不同國家擁有緊密的經濟關係，國際情況也不支持美國走向與中國新冷戰，美國同盟國也面臨很大的壓力，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維持多邊主義，加強與包含歐洲國家的其他國家經貿關係，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許多國家尋求中國與美國之間平衡的立場（Guo Shuyong、Li Boran，2021：7-10）。

第三個是中國與美國都有危機控制（crisis control）的經驗，例如在 1996 年的台灣海峽飛彈危機、1999 年的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大使館事件以及在 2001 年在南海發生的中美撞機事件等，但是中國與美國都成功謹慎的處理事情而能夠避免升級緊張（Guo Shuyong、Li Boran，2021：10）。

關於同盟的部分，美國為了包圍中國難以形成類似北約的同盟，川普政權的外交政策是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脫離國際條約減少提供公共財，美國的國際評價也隨著降低，美國同盟也對於形成包圍中國的同盟非常謹慎。（Guo Shuyong、Li Boran，2021：7）。



於海洋、馬躍（2020）認為定義美中「新冷戰」的方式有兩種，第一個是強調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之相似性的將現在新冷戰作為美蘇冷戰之重演，第二個是強調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之不同的將現在的美中關係理解為一種與美蘇冷戰完全不同的兩個大國之間的競爭關係，他們認為這兩種解釋都有限制，美蘇冷戰時期的核恐怖平衡、兩大陣營、代理人戰爭與意識形態對抗在今天沒有特別明顯。在這樣子的脈絡之下，作為新冷戰的標誌，他們提出了四個，即對抗的高風險、中間地帶的逐漸消失、新的對抗領域與對抗方式。

於海洋、馬躍（2020）認為新冷戰還未發生，因為國際經濟體系融入地很深，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是在相互依賴之下發生的，此外，差異政體克制共存的歷史傳統，也就是，美國與中國之間有自我修復能力，加上，國際社會的滲透性，比起蘇聯現在的中國更加融入國際社會。因此，於海洋、馬躍（2020）對於現在美中關係的看法是，冷戰色彩只出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裡面，所以以新鐵幕來形容美國對中政策比較恰當，其有四個特色，第一個是意識形態領域，美國企圖將反中意識擴散到西方國家並成為政治正確，第二個是在國際經濟領域發生的美中貿易戰，美國企圖中國接受美國的管理特權，美國原本的目標是減少貿易上逆差，但是後來美國的目標轉變為由美國的偏好來壓制中國並削弱中國經濟，第三個是軍事安全領域，美國企圖將中國周邊國家去遏制中國，想要軍事包圍中國，此外，在太空和網絡領域也追求單邊優勢並在此領域也遏制中國，第四個是在國際政治領域，在該領域也美國削弱中國的活動空間（於海洋、馬躍，2020：37）。這些新鐵幕的內容與新冷戰的區別有三個，第一個是對抗的風險比較低，雖然美中關係是對抗性的，但是目前的對抗目標為封鎖中國，還未達到威脅中國生存的程度，其封鎖對象的領域也並不大，美中兩國都有政策彈性，而使得對抗程度沒有很大，第二個是成本的高敏感性，現在的美國對於短期收益非常敏感，美國外交政策的排序也擁有模糊的地方，第三個是結果的可控性，美國比起威權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之間的意識形態之戰，偏好選擇比較可預見的經濟與法律手段，如修正國際規則方面上施壓給中國，

美國的新鐵幕戰略之主要目的為控制，美國仍然將中國視為可以共存的挑戰者（於海洋、馬躍，2020：37）。



小結

表 2 中國學界的看法

名字	機構	肯定/否定	主要理由
楊奎松（2019）	華東師範大學	肯定	仍然存在意識形態對立且還未熱戰
楊勇萍、潘迎春（2021）	武漢大學	肯定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趨向「新冷戰」
趙慶寺（2018）	華東政法大學	否定	「新冷戰」只是一項長期的對華戰略
趙可金（2020）	清華大學	否定	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軟戰時代
陶文釗（2021）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否定	美中間的相互依存
張文本（2018）	北京航空宇宙大學	否定	現在美中關係的本質是制度競爭
章百家（2020）	中央黨史研究室	否定	中國沒有出口意識形態，美中也在同一個經濟體系內共存
黃忠（2022）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	否定	美中間的軍事力量差異，中國在經濟層面扮演重要角色，意識形態差

			異沒有到造成威脅的程度
Guo Shuyong、Li Boran (2021)	上海外國語大學	否定	因為美中間沒有政治基礎、經濟基礎，有危機控制經驗美中冷戰是可以避免的
於海洋、馬躍 (2020)	吉林大學	否定	美中間有相互依賴關係

在中國的學術界裡也現在的美中關係為非冷戰的主張比較多。其中，肯定現在美中關係為冷戰狀態的主張主要有兩個判斷基準。

第一個看法是，將不同意識形態與不同社會政治形態之間的差異為“冷戰”之根源的看法，也就是將冷戰的本質作為社會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間對立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間競爭，且所有人都不希望熱戰的話，冷戰是仍然存在著。

第二個看法是，將美蘇冷戰之定義為全面對抗、意識形態對立、具有兩大陣營以及經濟脫鉤的話，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已經擁有「新冷戰」的趨向，具體而言，美中之間的經濟權力競爭和其背後的意識形態競爭，在權力、制度以及文化三個方面的競爭長期累積的結果呈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上，到現在川普政權以及拜登政權時也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其中，美中貿易戰是美中之間經濟議題的權力競爭以及美中基於不同發展模式的制度競爭，因此美中貿易戰是新冷戰之前奏曲。美國以及日本等其同盟國因為經濟權力競爭與其背後的意識形態競爭，它們圍堵“中國道路”，並以“毒丸”條款來排擠中國。在這樣子的美國對中國政策上的新冷戰趨勢發生的原因上，將這個新冷戰的定義為「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暴力衝突狀態」，並新冷戰具有三個特徵，即「強烈的對抗性、非直接的暴力性、意識形態的對立性」。



否定現在美中關係為冷戰狀態的主張有幾個判斷基準。第一個看法是將「新冷戰」作為一個美國對中國的長期戰略，現在各國間的利益關係很複雜，美國同盟國也不太會跟隨美國。

第二個看法是，美蘇冷戰時候美蘇之間沒有相互依存，但是現在美中關係而言該兩國之間有相互依存，雖然川普主張脫鉤中國但是中國仍然具有相當吸引力的市場，經濟依賴程度非常高，因此無法承受冷戰的爆發。

第三個看法是在世界緊迫的問題是改革與調整現在的世界秩序，其需要美中兩國的參與。

第四個看法是中國與蘇聯不同，中國沒有將中國的意識形態以及發展模式，且美國與中國都在同一個經濟體系內共存。

第五個看法是主張現在美中關係是新冷戰的只關注表象特徵層面，從體系、國家和人的三個層次來看美中關係的話，雖然其他國家在經濟與軍事領域上難以趕上美中兩國，但是仍然中國的軍費佔 GNP 之比重以及核武數量來看，美中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此外，在氣候變遷以及新冠疫情等非傳統得安全議題之重要性的提升，國際社會傾向於彼此合作，在經濟層面也美中競爭僅限於追求發展權領域內。

第六個看法是美中都有危機控制的經驗，在以往的危機美中都成功謹慎的處理事情而避免危機的升級。

第四章 日本學界的看法



第一節 「新冷戰」爭議出現的背景

關於「新冷戰」的出現，吉村（2021）認為新冷戰此一詞作為能夠簡單地表現當代混亂的國際關係，而在媒體上被使用的數次愈來愈增加，但是還未有其共通的定義，通常使用新冷戰此一詞的原因是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美蘇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一樣的冷戰思維，不過這樣子將國際關係簡單化會將實際的國際關係變得曖昧模糊，容易產生誤會容易將根本問題歸屬於特定國家、政治體制以及領導人，此外，拜登政權裡面也可以看到的“大國間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自由主義 vs. 威權主義」等政治標語將意識形態對立要素加進去，甚至惡化對於現狀國際關係的認知可能性，這樣子的冷戰思維在中國不受歡迎，擔憂意識形態外交的升級是否產生像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失敗，這些二分法的看法是在美國比較佔主流，拜登政府甚至民主黨以及共和黨傾向於站在此二分法之立場，此外，俄羅斯與中國對於現在國際體系的看法都是多極體系（吉村拓人，2021：68-71）。³⁴關於現在實際上的國際體系，尤其是 2010 年以後隨著中國的崛起，卻沒有對於國際體系的單一看法，“大國間競爭（GPC）”的概念是將現在國際關係視為競爭性體系的表現之一，能夠簡單地說明複雜的現在國際關係，川普政權以後成為一種流行語，但是其包含的問題是此一單詞沒有明確地定義競爭參與者、原因或理由以及該競爭的目標，因為穩定的霸權沒有競爭，所以此一詞的出現代表霸權相對來講的衰退，但是對於其競爭的程度與極，還未有同一的看法，具體而言，主張現在國際體系為單極體系的主張內容為相信北約等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裡中國或俄羅斯還未

³⁴ 俄羅斯與中國都認為現在國際體系為多極體系，俄羅斯而言，其背景擁有美國失敗於介入中東、對於 ISIS 沒有實施措施、史諾登事件等導致美國霸權衰退，歐巴馬政權宣言美國不是世界的警察，川普政權之外交要求其同盟國更多負擔，中國而言，雖然中國主張不會尋求霸權，但是習近平在 2012 年時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並主張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需要大國間的相互理解、妥協，這些主張暗示世界體系為兩極體系（吉村拓人，2021：71-72）。



相當西方規模的程度，主張現在國際體系為兩極體系的主張內容為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美蘇冷戰般的美中新冷戰，並認為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方面包圍中國能夠勝利此場冷戰，但是在此發生的問題是缺乏美蘇冷戰與美中冷戰之間的差異、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重視以及將又全球又高科技的中國視為唯一的對手，此脈絡在於攻勢現實主義，對此，同樣主張兩極體系但將主軸為意識形態的主張內容是「自由主義 vs. 威權主義」，此看法是將中國、俄羅斯、伊朗以及北韓等國家都歸納為威權主義陣營，最後一個看法是將現在國際體系視為是否正在走向多極體系的主張，如果認為是的話，國際體系由各國協調來走向權力平衡，但是現在的各個國家明顯的沒有有像協調關係，也能看到軍事競爭，沒有 19 世紀的重來（吉村拓人，2021：70-72）。關於美中“新冷戰”在 2014 年開始的，兩極體系的美蘇冷戰在 1991 年結束之後，國家間、非國家行為者之間開始以聯合國為中心地協調，轉移成無極的「後冷戰」。在 2001 年發生 911 事件之後，開始以美國為中心的一極和恐怖份子等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反恐戰爭」。在 2014 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並在同年俄羅斯被凍結八大工業國組織（G8）之會籍，導致大國之間、地域主要國家之間的對立，而進入「新冷戰」。（吉村拓人，2021：81）。

松本はる香（2019）認為在國際社會上擔憂美中關係長期對立，其代表現象為「美中貿易戰」以及「美中新冷戰」等詞彙的出現，尤其是在 2018 年以後美中彼此將關稅提高是其擔憂的原因，美中對立也從貿易問題擴及到安全保障問題等不少領域，其中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轉換為強硬立場的一個契機是在 2018 年 10 月 4 日麥克·彭斯美國副總統在華盛頓哈德孫研究所舉辦演講，³⁵其演講以知識財產權之侵害、貿易赤字、匯率操縱以及中國共產黨強制在中國的美國企業提供企業秘密作為在中國做事業之代價等為主要問題，此外還提到中國用中國學生組織和學者協會等監視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對於在美中國學生實施言論統制以及操縱情報來普及對中國有利的情報，甚至中國對於美國的大學、研究機關、智庫以及研究者進

³⁵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October 4, 2018 at Hudson Institution.



行投資來企圖阻止公開對於中國共產黨不利的研究成果，這些中國的行為或多或少有關於中國在海外的「統一戰線工作」，³⁶它們的這些活動在澳洲、紐西蘭以及美國等變多，也有看法將「孔子學院」³⁷視為統一戰線工作之一環（松本はる香，2019：1-2；遊川和郎，2019：9）。此外，在中國決策者間有了需要準備與美國的長期對立之共識，但是習近平政權並不一定希望長期對立，因為在 2018 年 12 月決定「不對抗、不打冷戰、按步伐開放、國家核心利益不讓退」之「二十一字方針」，加上在 2019 年 3 月的第 13 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裡李克強對於美中貿易摩擦提到繼續美中間協議的重要性並希望能夠實現互惠關係。許多人還把這次演講比作定義冷戰的「鐵幕」演講，並擔心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新冷戰」開始（江藤名保子、森路未央，2019：135）。從此以後美國逐漸加緊與中國的緊張關係，開始政治、經濟、技術、安全等不同領域對中國實施遏制，隨之中國也升級反制（於海洋、馬躍，2020：16）。

歐巴馬政權在 2009 年的第一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裡發言說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形成 21 世紀，自從美蘇冷戰結束 20 年，企圖將中國納入為美國的全球秩序，建立美中相互依賴體制，中國則利用美蘇冷戰結束後的美國秩序而快速地發展，在 2014 年的美中戰略經濟對話裡習近平提倡美中新型關係並強調大國關係之新的模式，但是到了 2015 年歐巴馬政權將對中態度變硬，在 2017 年川普發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為契機，美國對中政策從以對話與協議為基礎的「関与」轉變為將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並企圖將中國從美國主導的全球網（global net）脫鉤來維持美國的霸權（奧村，2020：16-19）。川普就任總統之後的一年內就發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與「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在 2017 年發表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的主要內容為「美

³⁶ 中國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借助黨外人士或勢力的協助，擁有對中國國內的潛在敵對政治勢力施加壓力的角色，在海外也有宣傳中國共產黨等工作，在 2015 年 5 月隔了 8 年舉辦了中央統一戰線工作會議，設置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從這個時候其工作部員大幅度增加，在 2017 年的第 19 次黨大會裡也習近平主張重視統一工作戰線（松本はる香，2019：2）。

³⁷ 「孔子學院」是在世界 120 個國家以上的地域裡有 450 個以上，其授課內容有中國政府的意志，也被視為輿論操作（松本はる香，2019：2）。



國優先」與以「實力求和平」，將世界視為競爭世界，中國與俄羅斯挑戰美國，在過去 20 年美國認為接觸競爭對手將它們包含國際機構與全球通商裡，它們而變成能夠信賴的夥伴，但是這些想法是錯的，美國則表示作為需要達成的目標，即美國國民、領土、美國人的生活之保護，以實力求和平，強化美國影響力，這四個項目之外，此戰略表示美國一直擁護基於互惠主義、自由市場以及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體系，與同盟國和夥伴國家協作、國內經濟回覆、科學技術革新之主導、學術機關與研究所、防護以及促進私立部門之間的知識網絡之美國國家安全保障創造基礎（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NSIB）以及能源支配的重要性，加上，有三個具體的任務，即大國間的競爭重新發生，在其中建立美國比較優勢的地位，因為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大國間競爭的重來，比以往更加難以抑制該兩國、以軍事力為中心的能力上升，由於新的技術，建構更容易更新的軍事能力，指出防衛產業基盤相關的問題以及維持並現代化核武能力，在宇宙領域確保主導性，網絡空間的迅速對應以及預防被竊取情報，最後一個是外交與治國才能（statecraft）（下存拓哉，：2）。接著在 2018 年 1 月 19 日美國國防部發表「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其中安全保障環境更加複雜化的認識之下，與「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同樣將中國與俄羅斯視為挑戰既有國際秩序挑戰的修正主義勢力，戰略競爭會長期化，還提到快速地科技技術發展導致戰爭性質的變化，甚至說美國本土也已經不是安全，從「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與「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裡可看到美國以往政權繼續的由力量重視國家間關係的現實主義政策（下存拓哉，：2）。

歐巴馬政權而言，為了牽制在 2010 年針對南中國海的外交政策轉換為更強硬的中國，在 2011 年宣言將重心向亞洲轉移，在同年的 11 月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裡強力支持 TPP，訪問澳洲表明以後在達爾文（Darwin）放 2500 人規模的美國海軍陸軍隊，接著在東亞峰會（EAS）裡強調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並要求遵守國際法，對此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並沒有很大的改變，繼續盡量迴避與美國



衝突，強化與其他國家關係來擴大影響力，改變的是中國對俄的看法，美國重視亞洲之前，中俄之間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美國回到亞洲之後，對於中國如俄羅斯和巴基斯坦等國家重要性提升，中國企圖強化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在美蘇冷戰之後，川普之前，也就是 2001 年 1 月成立的喬治沃克布希政權之後，美國將中國規定為「戰略的競爭對手」，顯示對中國的警械感，雖然美中俄在阿富汗戰爭時有反恐怖主義的共識，但是在 2003 年以美國與英國為中心的軍隊開始攻擊伊拉克之後其共識開始崩潰，對於俄羅斯與中國在自己國家的背後有美國或北約的軍事基地使得它們感到威脅，所以伊拉克戰爭使得中國感到強化國防力的緊迫性，使中俄關係的緊密化以及增強該兩國的國家主義，損害國際社會對於美國的信賴，加上，中國以經濟快速發展為背景，中國快速的擴大其軍事力，此事情使得美國感到威脅，在 2008 年的雷曼危機（Bankruptcy of Lehman Brothers）之後，中國在 2010 由大型景氣刺激政策來超越日本的 GDP，與此同時，美國開始認為中國在南海以及東海擴大海洋權益，在 2013 年中國在東海設定防空識別區等，這些被美國視為無視國際輿論的單邊主義的擴張主義，但是另一方面，關於在 1999 年的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之際中國的駐北爾格勒大使館被炸的事情，在中國還是有它是因為中國支持南斯拉夫，所以北約故意炸掉該大使館之認識，中國將歐巴馬政權推進的「重返亞洲」政策也視為圍住中國的政策，這些雙方對彼此的認識與行動的惡循環是典型的安全困境，在經濟上互相依存，在軍事上是互相警械，在 2000 年的時候因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議會以及美國勞工聯合會對此的批評開始激烈，中國不透明的軍事擴大，美國設立「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檢討美中關係的經濟和安全保障問題，小布希在 2006 年與胡錦濤同意進行「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後來因為快速的經濟發展與軍事擴大而想要表示作為大國的自信之習近平在 2013 年與歐巴馬舉辦非公式的高峰會，在此提出「新型大國間關係」此一概念，雖然在 2009 年的美中高峰會裡使用「美中關係的升級與強化」此一表現，但是在 2011 年歐巴馬訪問澳洲之際明確表明亞洲以

及太平洋地域為最重要事項，將軍事與外交的重心移到該地域，但是後來因為敘利亞內戰以及殺害奧薩瑪賓拉登等在中東發生，因此歐巴馬政權需要注力於這些事情，中國在這個時候企圖擴大其實力，由中國主導來設立新開發（BRICS）銀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於這些國際情勢歐巴馬政權沒有大戰略，沒有一慣性的對應（滝田賢治，：587-592）。

美中貿易戰是接近「新型冷戰」、「新種冷戰」的國家戰略之起始點，美中貿易戰以美國對華為實施制裁為契機，有外溢到高科技霸權、軍事霸權領域的可能性（奧村，2020：28-44）。

另外的看法是美中新冷戰是從中國習近平政權與美國川普政權時期開始的對立關係，中國崛起不僅是「和平崛起」，也開始否定既有的國際秩序，而美國也開始箝制中國，問題在於中國的言行不一³⁸，對美國而言中國的這些行為以及野心是個重大的挑戰，中國將川普政權對中制裁視為“冷戰思維”，但是中國的“冷戰思維”是從毛澤東時代至現代的反美標語之一，³⁹從 1960 年代雖然蘇聯警告美國中國自己擁有他的劇本（scenario），中國為了爭奪世界舞台上主角，會做出任何事情，但是美國沒有聽此警告，反而尼克松在 1972 年時訪問中國在外交、軍事、經濟、金融以及教育等各個領域支援中國，在 2001 年美國承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供中國成為經濟大國的機會，後來中國由「中國夢」開始否定既有的國際秩序（吉村拓人，2021：16-19）。

遊川和郎（2019）認為美中新冷戰發生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在過去 20 年內依據它的市場與經濟力，不僅是多邊主義，利用兩國之間裡的優勢，否定在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異論，而形成對中國有利的環境，另外個是因為先進國家之間，

³⁸ 其具體內容為如中國關於藏區問題自己不遵守十七條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和平的幌子之下入侵西藏，在香港制定逃犯條例（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和香港國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來實際上將「一國兩制」無效化，在國際秩序上也雖然主張「從不當頭」，但是實際上習近平將「韜光養晦」戰略轉換為「有所作為」戰略（チュイデンブン，2021：15-16）。

³⁹ 毛澤東的反美帝國主義以及 1950 年代的「大躍進」政策都一致於達爾文思想，這種思想是現在中國主張的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原型（チュイデンブン，2021：17）。



或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國際協調的框架之效果開始變弱，其他國家默認中國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的行為，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以往對中國的期待龐大，因此失望也很大，加上中國的崛起變成新的威脅，為了遏制這些循環開始制裁中國，新冷戰的主要問題從通商問題到技術霸權問題，甚至擴大到台灣以及中國周邊的安全保障問題。

第二節 肯定論



中島精也（2023）認為在 2022 年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裡說，後冷戰時代的結束是決定的，形成下一個時代的主要勢力間（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競爭，是世界已經轉至為新冷戰時代。

在 2021 年，因為喬拜登政府開始包圍中國，這使得中國感到威脅而開始接觸北韓與俄羅斯，在此脈絡之下北韓重新開始發射飛彈，俄羅斯開始侵略烏克蘭，現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際，俄羅斯會需要中國的支援，烏克蘭對抗俄羅斯時會受到美國的影響，這樣子的狀況換言之是美中新冷戰，可以與美蘇冷戰時的韓戰比較，也就是美中進行代理戰爭，（Matsuda Yasuhiro，2022）。

肯定現在美中關係是新冷戰的チュイデンブン（2021）認為美中新冷戰是中國的習近平政權與美國川普政權的建立來走向未有的對立關係之結構，為什麼其關係被稱為「冷戰」的原因是中國的崛起並不是「和平崛起」，中國則開始否定既有的國際秩序，因此美國開始採取箝制中國崛起的政策，在 2012 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主張有準備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透過「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政策來企圖構成由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開始對立美國，此對立不僅在貿易領域還擴及到科技技術、國家安全保障以及人權問題等問題，甚至被稱為「新冷戰」或「美中冷戰」，這個美中冷戰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也就是從美中貿易戰或貿易摩擦，具體而言，美國與中國彼此施加關稅而企圖讓對方的東西在自己國家賣的不好，因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製造很多東西以低價為賣給美國，導致美國龐大貿易赤字，雖然在 2019 年 1 月 30 日美中舉辦貿易協議中國決定購物大量美國農產品，但是在安全保障領域中國批判美國，5 月 10 日美國再課更多關稅甚至實際上禁止對於華為技術等高科技企業的出口，接著美中貿易戰與 5G 產業直接相關的，因為 5G 不僅是單純的訊號設施，也擁有成為工廠自動化、自動開車以及網絡時代的社會基盤的可能性，與下一個時代的產業主導權密切相關，此外，中國

強力支援中國製造 2025、「千人計劃（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以及人工智慧等高科技產業來強化影響力，實際上華為技術在 2017 年其銷售量成為世界第一名，但是在此有一個問題是中國在 2017 年制定的「國家情報法」規定中國的國民以及企業需要支持並協作中國國家情報局，所以中國透過通訊公司等能夠竊取世界各國的情報，對此美國在 2019 年基於「國防權限法」來將中國的五個企業拒於門外，此外，關於 AI 武器之自主武器（LAWS）也有美中之間的競爭，最後美中競爭擴及到宇宙領域。（チュイデンブン，2021：15, 20）。

吉村拓人（2021）分析從美蘇冷戰到“新冷戰”，將從 1945 年到 1991 年的美蘇冷戰定義為兩極體系下主要行為者以及它們關係為超級大國主體在對立關係，則將新冷戰定義為多極體系（三大極＋準極）下擁有多樣性價值觀主要行為者之間的對立，也就是以國家行為者作為中心的對立性多極體系（吉村拓人，2021：79, 81）。⁴⁰他認為雖然美國對於恐怖主義的戰爭實現美國的單極體系，但是美國批判伊拉克、雷曼危機（Bankruptcy of Lehman Brothers）以及長期軍事負擔等事情使得美國的霸權地位退步，與此相對，其他國家介入中東政變而擴大利益成為「準極」，之後在 2014 年的時候俄佔克里米亞為契機，俄羅斯失去八大工業國組織參與資格，美俄之間穩定關係以及美國單極體系崩潰並產生大國間有對立關係的國際體系，加上，新冷戰的行為者不僅只有美中俄大國，⁴¹這些行為者之間關係而言，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和介入美國總統選舉的可能性等採取了對外攻擊性政策，對此美國制裁俄羅斯，在各地支持對立俄羅斯勢力，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崛起，並一帶一路、5G 等對外擴張其勢力，美中衝突成為常態後其擴及到經濟以及技術領域，原本是國家對恐怖主義勢力等非國家行為者的結構重新變成國家對國家的結構，此外這樣子的全球性公共領域成為極之間對立為新冷戰特徵之一（吉村拓人，202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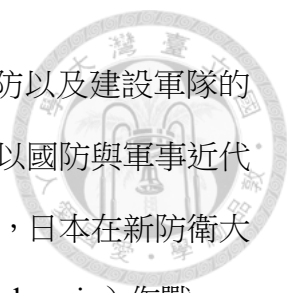
⁴⁰「準極」是作者提出的概念，其意思是

⁴¹印度為了對抗中國，以軍事大國為目標增強其軍事力量，原本俄羅斯和法國購入武器，但在 2020 年開始禁止有些武器以在自己國家內製造武器為目標，此外在中東土耳其也開始在國內生產武器，伊朗也在軍事介入伊拉克、敘利亞、葉門的同時，由派遣伊斯蘭革命衛隊來提供各地先進武器技術來間接擴大其權力（吉村拓人，2021：89）。

⁴²雖然拜登政府主張「自由主義 vs. 威權主義」以及 GPC 等意識形態上的兩極體系，但是拜登政權實際上的行為裡面可以看到川普政權的非意識形態的單邊主義般的行為，對此俄羅斯的反美多極主義、中國的「中國夢」以及其中的「一帶一路」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對抗主軸，此外隨著準極的發展，印度的印度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等基於意識形態的世界觀也在各地開始受歡迎，新冷戰的世界觀都是以國家為中心，導致國際體系之不穩定（吉村拓人，2021：81）。

下平拓哉（2020）分析美中新冷戰下的戰略文獻，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的軍事遊行裡的習近平演講發表洲際彈道飛彈（ICBM）的「東風（DF）」、潛射彈道飛彈（SLBM）「巨浪（JL）2」以及無人潛水機等新的武器，川普則表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以及「以實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在 2019 年 7 月 4 日的獨立紀念日川普總統強調美國力量，在 2017 年 10 月中國則強調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宣言建設世界一流的軍隊，在 2019 年 7 月 2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從 2015 年隔了 4 年發表 2019 年版的國防白書「新時代的中國國防」，其中也再次強調「新時代」的中國，首次反映改革軍隊，此國防白書的目的為深化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國防的理解，在中國對於世界的看法為隨者世界的多極化、經濟的全球化、社會的情報化、文化多樣化等，雖然和平或發展、協作等並不是與現在逆流的，但是世界的安全保障面臨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也更加顯現，不能說世界是平安的，另外認為國際性戰略競爭在增加，美國調整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與國防戰略，展開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激化大國間競爭，大幅度增加軍事費，核武、宇宙、網絡等領域加速向上其能力，導致損害全球戰略穩定，另一方面認為亞洲太平洋領域是穩定的，南海情勢是穩定的，這些中國對國際情勢的評價與美國和日本的不一樣，加上，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之特徵為堅持永遠不尋求霸權、永遠不擴張、永遠不尋求勢力範圍，但是其中第四

⁴² 除了這些大國之外，準極之間關係由於利益或意識形態矛盾而惡化，它們各個支持或雇用非國家行為者作為其代理人，此狀況類似美蘇冷戰時期代理戰爭之複雜版本般地域糾紛，另外雖然極與準極對立關係很罕見，但它們關係也走向對立關係（吉村拓人，2021：89）。



章為中國堅持強化具有中國特色的軍士力量，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以及建設軍隊的戰略目標為到 2020 年實現機械化，提高戰略能力，到 2035 年以國防與軍事近代化為目標，如此作為大國的美中揭示軍事戰略炫耀其力量，此外，日本在新防衛大綱裡開始構想設備「多次元統合防衛力」以及「領域橫跨（cross domain）作戰」，作者認為日美都強化與澳洲以及印度間關係是很重要（下平拓哉）。

田中明彥（2020）認為現在正在進入新冷戰，美蘇冷戰是美國與蘇聯作為兩大軍事大國之間的權力鬥爭，且馬克思列寧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個意識形態之間的思想鬥爭，其中有一段時期美蘇之間幾乎都沒有經濟交流，擁有能夠灰滅彼此好幾次程度的核武器，所以雖然難以說現在的美中關係與美蘇冷戰的結構完全一致，美中擁有的核武器數量間有差異，俄羅斯擁有的核武器比中國有的多，且不一定俄羅斯完全協助中國，中國公式的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已經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系統也沒有得到世界的評價，但是現在美中關係裡面還是有「冷戰」要素，第一個是中國的經濟力的快速成長，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大國，美國、日本、韓國以及印度等的最大貿易對象都是中國，雖然中國的軍事費還未達到美國軍事費之程度，但是還是在亞洲裡的話壓倒性的軍事大國，第二個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雖然中國已經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般的系統性的理論，但是可以看到中國表示雖然沒有採取自由主義，也可以發展經濟之模型，中國正在走向的並不是推進民主化政治改革，而是為了在增強其威權主義體制的同時，尋求最高端的產業技術力量，對於這樣子的中國動態，雖然在 1990 年代有一個懸念中國的經濟成長導致中國軍事力之增強，但是美國歐巴馬政權採取了接觸政策（engagement），⁴³因為當時美國期待著經濟成長會帶來民主化，美國也有自己在軍事領域以及技術領域的優勢不會崩蹋，但是到了 2010 年代中國在國內言論管制愈來愈強，對東海以及南海開始壓迫性行為，由修憲來將國家主席任期拿掉，在把自己國家的情報不流外的同時，中國

⁴³ 在 1990 年代當時的想法是雖然美國擔心中國經濟成長是否導致中國成為軍事大國，而挑戰自由主義秩序，但是在當時圍堵中國一定將中國推到敵國身份，因此這樣子的政策不恰當，但是也接觸政策也並不一定中國不挑戰既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因此美國當時的想法是對中國採取接觸政策的同時，強化以及維持同盟關係（田中明彥，2020：264）。

能夠以合法及非合法渠道積極地收集世界資料，因此在美國以川普批評中國為契機，美國國內對中國的不滿爆發，這樣子的狀況確實是「冷戰」（田中明彥，2020：261-266）。

另外，作為在日本學術界的一個肯定論，安全保障研究（security studies）一個特輯叫做「守護國家-「新冷戰」下的防衛論（Defending Our Country-Defense Policy in a “New Cold War” Era）」，其中討論日本周邊國際環境的安全保障環境之變化、「台灣有事」、日美同盟關係的走向與問題等議題。在東亞（East Asia）也有特輯「美中“新冷戰”之下的東亞」，在其中神谷万丈（2019）認為現在美中對立為超越貿易戰，呈現「美中新冷戰」的結構，由美國主導的以又自由又開放規則為基盤的國際秩序受到挑戰，在戰後的東亞以及世界穩定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所支撐的，具體而言它是開放性，但是因為在東亞中國崛起其秩序開始不穩，雖然美國、日本以及歐洲等自由民主國家一直期待著中國不會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日本而言在 2009 年左右釣魚臺列嶼問題等的影響，發現中國欲發展愈以修正主義性外交態度來推進外交，美國和歐洲諸國也對中國擁有與日本同樣的看法，其象徵性的現象是彭斯美國副總統的演說，美中對立不僅是單純的貿易戰，是否以美國為中心的既有國際秩序會贏，還是會轉移至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與美蘇冷戰一樣兩個體制之間的競爭（神谷万丈，2019：10-11）。在此他提出一個問題，也就是為了守護以規則為基盤的國際秩序，但是川普政權所採取的單方面的提高關稅會與既有國際秩序產生矛盾的，此外，美中新冷戰與美蘇冷戰之間很大的差異是各國之間有緊密的經濟關係，不得不考慮與中國協作，因此現在是一方面要對抗的領域需要與中國對抗，一方面與中國協作的非常複雜的狀況（神谷万丈，2019：1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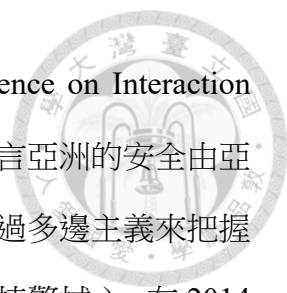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否定論



在日本探討現在美中關係是否新冷戰的文獻比較少，大部分的文獻都基於現在的美中關係已經是新冷戰，或正在走向新冷戰之前提。Keikichi Tkahashi (2022) 認為現在美中之間競爭並不是新冷戰。雖然美中關係在地緣政治上以及意識形態上在緊張關係，且此緊張關係確實類似美蘇冷戰，但是拜登在，2021 年 9 月 21 日的演講裡說，並不是尋求新冷戰，在印太戰略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⁴⁴裡否定美國企圖改變中國，其戰略承認美國與中國為了利益和未來展望競爭，其競爭並不像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中國是競爭對手，所以有空間追求建立協作關係。

松本はる香 (2019) 認為現在美中關係正在走向「美中新冷戰」，他分析從歐巴馬政權時期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時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從協調轉移到強硬，從川普時期南海問題以及中國的「統一戰線工作」等問題的角度來分析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強硬的過程，在 2012 年 2 月時習近平訪問美國，其目的為表示將胡錦濤與歐巴馬一起建構的美中夥伴關係繼續發展，並提出美中關係需要建構「新型大國關係」，但是還未有得到無法讓步的安全保障上的利益在哪裡存在，美國雖然避開明確地答案，但是還是表示歡迎採取與中國建立協調關係，這時候美國剛好在接近總統大選，中國也在同年要舉辦中國共產黨第 18 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此美中雙方沒有主張很大的要求，隔年習近平與歐巴馬再次舉辦高峰會的時候中國企圖給美國中國是能並肩美國的超大國之印象，在此時中國透過將「新型大國關係」定義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共贏，在表示中國沒有對抗美國的意圖的同時，想要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後來中國在同年 11 月在東海強硬設置「防空識別區」，當時歐巴馬雖然有「重返亞洲」以及「在平衡」政策，但是未有明確方針，尤其是南海主權問題沒有直接的介入，歐巴馬第二任期的時候中國推進「一帶

⁴⁴ The White House, 2022: 5。



一路」，在 2014 年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CICA]）」裡習近平宣言亞洲的安全由亞洲保護，任何國家不應該獨佔地區安全保障，這些行為意味著透過多邊主義來把握地區主導權，對美國而言，這些行為排除美國的地位使得美國抱持警械心，在 2014 年 11 月在北京 APEC 的美中高峰會裡歐巴馬表示避開提到「新型大國關係」的態度，在 2016 年 3 月的美中高峰會的時候習近平重新提出中國的最優先事項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但是歐巴馬沒有表示與此協調的態度，因為有這樣子的背景，美國對於中國的警械愈來愈高，美國對中政策轉移至施加壓力的方向，歐巴馬政權以與中國的協調關係為優先，其結果處理環境議題等比較容易得到美中雙方同意的議題，安全保障問題或人權等議題問了避免美中間的摩擦而被拖延，對於這樣子的狀況的不滿成為川普政權成立之背景（松本はる香，2019：89-91；增田雅之：76）。

益尾知佐子（2022）認為在中國國內 2021 年時有討論為了美中新冷戰的發生，以後如何與俄羅斯合作的問題，⁴⁵中國將與俄羅斯協助視為為了對抗美國威脅的必要途徑，由於新冠疫情世界被分段，連學者之間的交流都難以實現，這樣子的狀況加速走向新冷戰的步伐（益尾知佐子，2022：30-31）。

⁴⁵ 其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出版之「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的 2021 年第二號以後發表中國與俄羅斯如何為了應對固執世界霸權的美國，如何協作為題目的論文，其內容為減少依存 SWIFT 風險的脫美元化，為了應對美中脫鉤的科技協作以及為了應對食糧安全保障環境去惡化的共同安全保障機制等，因為中國的俄羅斯研究者之泰斗與趙華勝認為美俄冷戰已經開始，美國對中國與俄羅斯已經開始採取抑制政策，所以美俄應該相互協助來對抗美國的壓力（益尾知佐子，2022：30-31）。

小結

表 3 日本學界的看法

名字	機構	肯定/否定	主要理由
中島精也 (2023)	福井県立大学	肯定	依據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松田康博 (2022)	東京大學	肯定	烏俄戰爭
チュイデンブン (2021)	桐蔭横浜大學	肯定	中國的崛起並不是「和平崛起」，開始否定既有國際秩序
吉村拓人 (2021)	立命館大學	肯定	多極體系下擁有多樣性價值觀主要行為者之間的對立
下平拓哉 (2020)	事業構想大學院大學	肯定	以新冷戰為前提分析美中戰略
田中明彦 (2020)	東京大學	肯定	兩大軍事大國間的權力鬥爭，且有意識形態鬥爭
神谷万丈 (2019)	防衛大學	肯定	現在美中關係視為兩個體制之間的競爭
高橋慶吉 (2022)	大阪大學	否定	依據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

松本はる香 (2019)	亞洲經濟研究所	否定	美中關係正在走向「新冷戰」
益尾知佐子 (2022)	九州大學	否定	美中關係正在走向「新冷戰」

在日本學術界與美國和中國不一樣，肯定現在美中關係為新冷戰的主張以及以前提為現在美中關係是新冷戰的文獻比較多，其中肯定論的主張有幾個判斷基準。第一個是基於美國在 2022 年發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裡說後冷戰時代的結束以及承認新冷戰時代的到來。

第二個是將烏俄戰爭視為美國與中國的一種代理戰爭的看法。因為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時候會需要中國的援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時候則需要美國的援助，所以將此狀態視為美中間的一種代理戰爭的看法。

第三個是將中國的崛起不視為「和平崛起」，中國的崛起是否定既有國際秩序的，美國而開始採取遏制其崛起的政策，其具體內容為，透過「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政策來企圖構成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而開始跟美國對立，此對立從貿易等經濟領域擴及到科技、國家安全保障以及人權等問題。

第四個看法是將美蘇冷戰定義為兩極體系下主要行為以及它們關係作為超級大國主體在對立關係，則將現在美中新冷戰敬意為多極體系下用有多樣性價值觀主要行為者之間的對立，也就是以國家行為者作為中新的對立性多極體系。

第五個看法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力在快速的發展當中，中國也成為了世界最大貿易大國，不少國家之最大貿易對象都是中國，中國的軍事力在亞洲壓倒性的，在意識形態方面也中國雖然已經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般的系統性理論，但是在增強其威權體制。

第六個看法是美中對立超越貿易戰，已經有「新冷戰」的結構，美國主導的又自由又開放的國際秩序受到挑戰。

在日本學術界否定現在美中關係為新冷戰的主張基於雖然現在美中關係在地緣政治上以及意識形態上在緊張關係，但是拜登政府發表說美國沒有企圖改變中國，美中間的競爭並不是冷戰，中國是競爭對手有空間追求建立協作關係。



第五章 結論



綜合上述，在美國與中國的學術界裡關於現在美中關係為新冷戰的人都比較少，且有些主張是主張否定之際的一部分。但是日本學術界而言，探討現在美中關係是否新冷戰的學者本來不多，但是其中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新冷戰的學者比較多，以美中關係是新冷戰為前提，分析其原因的文獻比起美中多。是否這些差異的原因是如神谷万丈(2019)所說日本與中國間的在 2009 年左右釣魚臺列嶼問題等的影響？還是有其他因素的關係？

其中將在 2017 年川普就任美國總統，而發生的美中貿易戰為美中新冷戰開始的看法比較多。但是也有看法，形成此背景是從美蘇冷戰結束到歐巴馬政權的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以及美國的衰退，也就是期待經濟成展導致中國民主化的看法。但是後來中國沒有走向美國所期待的路線。在歐巴馬政權以「重返亞洲」政策為例，開始對應中國的崛起，到了川普政權時在美國內鷹派佔多數，開始美中貿易戰。

不管美中日學界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新冷戰的主要判斷基準是現在該兩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及治理價值觀上的不同，美國有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國則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因此將冷戰為不同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間的競爭的話，現在美中關係是新冷戰的狀態。在此背景下，美中之間有經濟競爭與脫鉤以及有集體或陣營，經濟競爭而言美中貿易戰為其代表，集體或陣營而言美國企圖以軍事力量與其聯盟來包圍中國為其例子。對此，否定論的主張是雖然美中之間有意識形態差異，但是與美蘇冷戰不一樣的是美國在國外推進華盛頓共識等政治價值，但是中國並沒有在國外推進中國的政治價值觀念，此外將新冷戰作為美國對中國的一個長期戰略，這樣子的話新冷戰只是美國單方面的外交政策，不是一個國際結果。肯定論主張美中間有經濟競爭，但是否定論主張美中在經濟上相互依存，雖然川普政權主張與中國脫鉤，但是中國的市場仍然具有相當吸引力，也沒有像美蘇冷戰般完全分開的經濟。



關於代理戰爭而言，有一個看法是將烏俄戰爭視為美中的代理戰爭，烏克蘭需要美國的援助，俄羅斯則需要中國的援助。

不同美蘇冷戰定義會影響現在美中關係是否冷戰狀態的判斷，因此可能需要共同的冷戰之定義，再比較美蘇冷戰與現在美中關係。但是還是將主要冷戰定義視為意識形態以及陣營間鬥爭的學者比較多，在判斷這些因素是否符合現在美中關係的時候各學者的看法再會分歧，也就是雖然美中有不同意識形態，但是將正在發生的美中間競爭的原因歸因於意識形態差異，還是中國的崛起以及其擴張行為，就是怎麼定義中國的崛起，還是歸因於美國單方面的新冷戰政策。但是不管是現在美中間競爭的原因是什麼，冷戰是一種狀態，因此可能需要的分析是對於美中關係的現狀本身。此外，不少學者認為現在美中關係在經濟領域相互依存的狀態，但是從川普政權時期很明顯的與中國開始脫鉤，否定論將此一事情視為不可能完全脫鉤，雖然政府這樣說，但是對企業而言中國市場還是具有吸引力，因此不太可能呈現像美蘇冷戰般分成兩塊的經濟區塊，且世界擁有如環境問題等各國需要共同解決的議題，此因素也不讓美中完全脫鉤的原因之一。這樣子來看，可能需要研究現在美中關係裡是否開始有經濟脫鉤與軍事競爭，或如美澳印日戰略上聯繫等以集體來牽制中國的樣子，這些現象以後會不會升級？還是會降級？

如上所述，如果將現在美中關係不是新冷戰的話，現在兩國關係以及國際關係是甚麼狀態？國際關係中的兩極體系？還是如吉村拓人(2021)所認為的多極體系？正在走向冷戰狀態？或是什麼樣子的狀態。關於美中實際上的權力大小如何測量？對於美國以及中國的權力大小的看法也還未有統一的想法。

有些學者主張美國將其意識形態擴及到其他國家，則中國並沒有這樣子的行為，但是從南海的視角來看，雖然沒有擴及其意識形態，不過中國擴及其海洋權益，透過「一帶一路」和「AIIB」等政策來增長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這樣子能不能說美蘇冷戰時期是以意識形態為主地擴及權力，現在的美國也仍然以意識形態為主，但是現在的中國是以經濟力和軍事力來擴及其權力，因此雖然與在美蘇冷戰時的意

識形態對立、軍事競爭以及經濟領域上的對立與集團化，且還未發生直接軍事衝突，這些樣子不一樣，但是包含不同型態的這些因素？也就是現在美中關係具有美蘇冷戰的因素，但是每個因素的大小以及程度上有差異。

另外，比較少文獻提到小國扮演的角色，雖然從現實主義觀點來看還是美中兩個大國關係為最重要以及最有影響力，但是如果將現在美中關係視為冷戰狀態，在美蘇冷戰時期的代理戰爭原因為兩個陣營的意識形態鬥爭、擴大自己陣營影響力、牽制對方而發生的話，發生代理戰爭的可能性會不會提升？在這樣子的時候美中間的小國有沒有甚麼生存模式？或有沒有小國的角色及影響力會變大？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丁永康，1990，〈冷戰與國際兩極體系〉，《問題與研究》，第 29 卷，第 9 期：69-81。

王帆，2000，〈關於冷戰起源的幾種解釋〉，《外交學院學報》，第 2 期：34-38。

王高成、王信力，2012，〈東亞權力變遷與美中關係發展〉，全球政治評論，(39)：41-62。

王蠅祖主編，1995，〈國際關係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田飛龍，2021，〈制度變遷視角下的中美新冷戰、西方缺失與世界秩序重構〉，《黨政研究》：79-90。

吳玉山，2021，〈從比較共產主義看中共百年〉，《政治學報》，第七十一期：1-31。

吳玉山，2021，〈超越川普的川普主義〉，《思想》第 42 期：67-75。

宋鷺、孫巧鈴、李欣潔，2021，〈美國智庫涉華研究的「新冷戰化」趨勢〉，《現代國際關係》，(04)：53-59。

李本京，2020，〈全面交鋒「類冷戰」中美關係翻新頁〉，《海峽評論》，第 355 期：51-57。

李本京，2022，〈致命敵對：類冷戰時期之中美對抗〉，《海峽評論》，第 381 期：28-31。

李明，2020，〈中美對抗：「新冷戰」還是「新衝突」？〉，《全球政治評論》72：1-8。

李明，2021，〈美中「類冷戰」南韓何去何從？〉，《海峽評論》，第 365 期：18-22。

於海洋，馬躍，2020，〈新鐵幕抑或新冷戰：美中關係現狀及中國應對之道〉，《社會科學》：15-27。

林正義，2020，〈美中關係的網路安全問題〉，《遠景基金會期刊》，第 21 卷，第 4 期：1-57。

胡聲平，2019，〈回到冷戰？美中臺關係的今昔變化與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68 期：13-20。

馬丁·雅克、許佳等，2020，〈美國「新冷戰」政策誤區論析〉，《東北亞論壇》，29 期，(06)：3-24。

張文本，2018，〈新時代中美關係特點及其本質-兼析蘇聯後期的外交失誤及目前“新冷戰”概念的錯誤〉，《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第 7 期：4-12, 93。

陶文釗，2021，〈中美關係不是「新冷戰」〉，《前線》，(06)。

游智偉，2020，〈新瓶舊酒的美中新冷戰：美中價值觀與勢力範圍之爭〉，《全球政治評論》第 72：9-20。

黃忠，2022，〈「冷戰」視角下的中美「新冷戰」〉，《國際論壇》，第 24 其，(02)。

楊勇萍、潘迎春，2021，〈美國對華「新冷戰」的演進邏輯〉，《國際觀察》，(02)。

楊奎松，2019，〈為什麼必須重視“冷戰”背後意識形態作用的研究？〉，《冷戰國際史研究》，第 2 期：167-170。<http://chinese-thought.ecnu.edu.cn/32/6f/c35083a406127/page.htm>

趙可金，2020，〈為什麼新冷戰是不可能的？〉，《人民論壇·學術前沿》：15-25。

趙慶寺，2018，〈“新冷戰”話語的演化邏輯與應對策略〉，《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8-39。

劉金質，2003，《冷戰史》（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Baijia Zhang., 2020., “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Sino-U.S. relation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pp. 1-13.

Beckley, Michael. 2018. “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 .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rands, H., & Gaddis, J. 2021. “The New Cold War: America, China, 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 *Foreign Affairs*, 100(6), 10-21.

Callahan, W. 2016. “China’s ‘Asia Drea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Regional Order.”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1(3):1–18.
doi.org/10.1177/2057891116647806

Christopher Layne. 2020. “Preventing the China-U.S. Cold War from Turning Ho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0, pp. 343–385

Engle, Eric. 2015. “A New Cold War? Cold Peace. Russia, Ukraine, and NATO”., 59 *St.L.U.L.J.* pp. 97-174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419414>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419414>

Guo Shuyong and Li Boran. 2020. “The Myth of the New Cold Wa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 No. 2

Hal Brands and John Lewis Gaddis. 2021. “The New Cold War America, China 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100(6), 10-21.

Hseik-wen Soong. 2020. “An analysis of the U.S.-China “New Cold War” and COVID-19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Taiwan Strategists*, 6, 1-1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Iskander Rehman. 2018. "Introduction: A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a New Cold War," policy roundtable: A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a New Cold War?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Jeffrey D. Sachs, 2019. "Will America Create a Cold War With China?," *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No. 13, SPECIAL DOUBLE ISSUE: THE NEW GREAT GAME (WINTER 2019), pp. 28-39

Jerry Harris. 2022. "Behind the US-China Cold War", *Institute of Race & Class* volume 63, Issue 3 <https://doi.org/10.1177/03063968211049764>

Kagan, R., 2008.,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Alfred A. Knopf.

Lake, D. A. 2018. "Economic opennes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lessons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 no. 3., 237-70.

Li Xing and Raúl Bernall-Mezza. 2021. "China-US rivalry: a new Cold War or capitalism's intra-core competitio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vol.64, no 1, e0010,.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Minghao Zhao. 2019.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l ?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71-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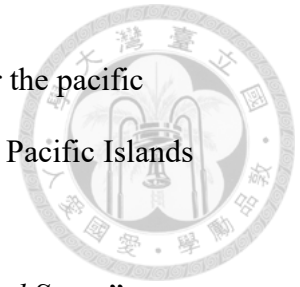
Robert D. Kaplan, 2019. "A New Cold War Has Begun", *ForeignPolicy*.

Rosenberger, Laura. 2020., "Making Cyberspace Safe for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4-13/making-cyberspace-safe-democracy>.

Seth Schindler., Jessica DiCarlo., Dinesh Paudel., 2021., "The new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21st-century infrastructure state", abable at <https://doi.org/10.1111/tran.12480>

Suisheng Zhao Guo Dan, 2019., "A new Cold War? Causes and Future of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pp.9-21

Terence Wesley-Smith,. (2021) “A New Cold War? Implicaionts for the pacific Island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pp.71-105)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2022.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Thomas J. Christensen. 2020. “No New Cold War Why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ll not be like the US-Soviet cold war”.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Thomas J. Christensen. 2001.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pp. 5-40., available from: <https://www.jstor.org/stable/3092132>

Tunsjo, Oystein. 2018. “The Return of Bipolarity in World Politic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o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Zhao Suisheng & Guo Dan. 2019. “A New Cold War? Causes and Future of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Vestnik RUD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 (1), 9—21. DOI: 10.22363/2313-0660-2019-19-1-9-21.

三、日文部分

チュイデンブン，2021，〈米中冷戦—国際政治の行方—〉，《桐蔭論叢》第 45 号：15-26。

ミンシンペイ，2022，〈新冷戦を戦うバイデンのアキレス腱〉，《Newsweek》，第 37 卷 29 号：15。

奥村皓一，2020，〈米中「新冷戦」と経済覇権〉，《新日本出版社》。

下村拓哉，2020，〈新冷戦時代における米中の軍事戦略と軍事パワーゲームの様相—インサイド・アウトとハイブリッド—〉，《危機管理研究》第 28 号。

吉村拓人 2021 〈「新冷戦」の構造的分析〉，《政策科学》第 29 期，(1)：67-87。

牛軍著，真水康樹譯，2019，〈米中関係と東アジア冷戦〉，《法政理論》，第 51 卷第 3・4 号：70-106。

江藤名保子、森路未央，2019，〈2018 年の中国 集権化が進む習近平政権，米中対立と経済減速による不確実性の拡大〉，《アジア動向年報》，(0)：117-150。

高木誠一郎，〈国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勢と米中関係 第三章中国における米国パワーの認識：中国の崛起とアンビバレンスの変質〉，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33-41。

山本吉宣，1992，〈冷戦と国際政治理論〉，1992 巻，100 号：16-34。

山本健，2021，〈ヨーロッパ冷戦史〉，《株式会社筑摩書房》。

山本健，2022，〈新冷戦とヨーロッパデタント〉，《西南学院大学法学論集》，西南学院大学学術研究所。

小嶋華津子，2019，〈習近平政権下の政治—集権化とその意味—〉，《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フィ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第 3 号（通巻第 138 号）。

松本はる香，2019，〈習近平政権期における米中関係の展開-「新型大国関係」の模索から「米中新冷戦」へ-〉，《問題と研究》：81-107。

松本はる香，2019，〈先鋭化する米中対立-「米中新冷戦」の争点〉，《IDE スクエア-世界を見る目》，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6 頁。

石井貫太郎，1991，〈冷戦体制の終焉と現代国際政治理論の新展開：新しい国際政治理論の構築へ向けて〉，慶應義塾大学法学研究会。

増田雅之，2015，〈パワー・トランジション論と中国の対米政策 —「新型大国関係」論の重点移行—〉，《神奈川大学アジア・レビュー》，第 2 巻：70-80。

中島精也，2019，米中貿易戦争は新冷戦時代の幕開け，国際金融，第 1321 号：22-25。

中島精也，2023，新冷戰で変わる世界の資金フロー，国際金融，第 1364 號：18-25。

遊川和郎，2019，〈新冷戦はなぜ起きたのか—中国を取り巻く国際環境の激変と中国の大国化〉，《ERINA REPORT (PLUS)》，第 150 號：3-10。

四、網頁部分

“New Cold War Between the U.S.and China”,Hudson Institution,2019-03-22,

「北京觀察：中南海擬定對美21 字方針」『多維新聞』2018 年12 月16 日、
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8-12-16/60105716_all.html. “Beijing
guancha : zhongnanhai niding dui mei 21zi fangzhen” [Observations from Beijing:
Zhongnanhai Established its US Policies in Twenty-one Words], DuoWei News,
December 16, 2018.

DAVID E. SANGER，2021，〈美中正在進入一場新冷戰嗎？〉，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usa/20211018/china-new-cold-war/zh-hant/> 2022 年 6 月 1
日看。

Doug Bandow, “Making Sure the Next Cold War Never Happens” ,CATO Institution,
2018-10-18,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making-sure-the-next-cold-war-never-happens/>

G. John Ikenberry. The next Liberal Order The age of Contagion Demands More
Internationalism, Not Less. Foreign Affairs. 2020 accessed on September 6,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09/next-liberal-order>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Accessed on August 30,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9/16/u.s.-china-trade-war-has-become-cold-war-pub-85352>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is-the-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a-cold-war/>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900-a-new-cold-war-between-the-u-s-and-china>

Hung Tran 2021 Is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 cold war? Atlantic Council

Hung, H. F. “The US-China rivalry is about capitalist competition.” Jacobin, July 11, 2020. Accessed on August 7,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7/us-china-competition-capitalism-rivalry>

Joseph Nye , 2021 , What is going on with China is not a ‘Cold War’ , The New York Times .

Kaplan, Robert. “A New Cold War Has Begu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7, 2019.

Accessed on December 3,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07/a-new-cold-war-has-begun/>;

Keikichi Takahashi, 2022, China-US Competition Is Not a New Cold W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 Indo-Pacific Strategy Shows the US dose not want a Cold War with China, THE DIPLOMAT Available from: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3/china-us-competition-is-not-a-new-cold-war/>

Lind, M. 2018. Cold War II. *National Review*, 10 May. available from

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5/28/us-china-relations-cold-war-ii/

Mitrovich, Gregory. “A New Cold War? Not Quit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1, 2019.

Accessed on August 29,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3/21/new-cold-war-not-quite/?utm_term=.d4523244634e



Niall Ferguson, “America’ s Values Will Help Win a New Cold War” ,George W.Bush Presidential Center, 2019-06-12, <https://www.bushcenter.org/catalyst/global-challenges/ferguson-winning-new-cold-war.html>



Niall Ferguson, “From Trade War to Tech War to Cold War”, Hoover Institution, 2019-03-28, accessed on available from: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trade-war-tech-war-cold-war>

POLITICO. POMPEO: Chinese threat may be worse than a ‘Cold War 2.0’ August 12, 2020. Accessed on September 6,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8/12/pompeo-chinese-threat-may-be-worse-than-cold-war-communism-394350>

Talmadge, C. 2018. Beijing’s Nuclear Option; Why a U.S.–Chinese War Could Spiral Out of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44–50.

White, H. 2019. Can the US Win the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Not without Risking a Nuclear W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March. Available from: 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united-states/article/2188648/can-us-win-new-cold-war-china-not-without

Zakaria, F. “The new China Scare: 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test challenge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9. Accessed on September 6,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12-06/new-chinascare>